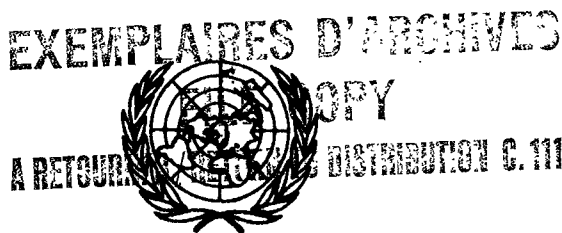


#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3/624  
14 October 1988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四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保护智利境内的人权

####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交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按照人权委员会1988年3月10日第1988/78号决议第12段编写的报告。

88-22932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  
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段次</u>	<u>页次</u>
一. 导 言 .....	1 - 8	3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	9 - 22	5
三. 关于侵犯人权的控诉 .....	23 - 24	10
四. 结 论 .....	25 - 68	42
五. 建 议 .....	69 - 93	55
<u>附 录</u> : 一. 智利政府对本报告第三节内所载指控的答复 .....		60
二. 特别报告员对1988年10月5日公民投票的评论 .....		63

## 一. 引言

1. 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大会一直在审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也讨论了这一项目。

2. 人权委员会按其1979年3月6日第11(XXXV)号决议，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调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随后，委员会在1980年2月29日第21(XXXVI)号决议中又请特别报告员将智利境内的失踪人员问题列入其报告内。

3. 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依次是：阿卜杜拉耶·迪埃耶法官(塞内加尔)、拉吉苏默·拉拉赫法官(毛里求斯)和1985年2月1日上任的现任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

4.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后，于1987年12月7日通过了题为“智利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的第42/147号决议。在第11段中，大会

“请人权委员会考虑到所掌握的一切有关资料，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采取最适当措施以促使有效恢复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以期审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

5.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第六次报告(E/CN.4/1988/7)。委员会在其1988年3月10日第1988/78号决议内：

“决定将专题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他就智利的人权状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后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可了这项决议(1988年5月27日第1988/140

号决定)。

6. 特别报告员按照上述各项决议，谨此提出1988年关于智利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以供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这也是他本人的第七次报告。这次，他继续获得智利政府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充分合作，向他提供了有关智利的人权状况的证词和文件。他根据智利批准的各项国际文书内所规定的规范和被公认为普遍适用的其他国际人权法的规范的规定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

7. 本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1987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但是，如有特别理由，在这个期间以前或以后获得的资料也会列入一并考虑。

8. 此外，由于本报告翻译和印刷方面的技术原因，特别报告员不得不在1988年9月初结束其工作。因此，无法载入1988年的最重大政治事件，即刚刚宣布将于1988年10月5日举行的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一事。尽管他将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下一次报告内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会竭尽所能，向大会初步介绍他第四次访问智利的情况。他计划应智利政府的邀请在1988年9月30日开始进行访问。

##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在人权委员会讨论关于智利的项目结束时，和在其通过1988年3月10日的第1988/78号决议后，智利的代表Mario Calderon Vargas 大使在看到他认为违反智利利益的该项决议后，以智利政府的名义告诗委员会说，智利要在继续合作方面恢复其自由，并将会从新考虑它在这方面的立场，因为显然没有意义的是，由人权委员会替一个国家任命一位报告员，然后不理睬他的报告。智利从其有限合作中毫无所得；而相反的是，对它的歧视却出现了增加。

10·从1988年3月直至1988年5月，特别报告员和日内瓦人权中心都没有收到来自智利政府或反对派的来函。特别报告员不希望由他或人权中心去结束这个僵局。他认为，最好能够确实知道智利政府的最后决定。

11·Calderon Vargas 大使最后宣布他会到圣何塞去访问该特别报告员。智利政府的两个代表和特别报告员于1988年5月6日在Algeria大使的官邸里见面。

12·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智利政府宣布它已经决定继续同人权委员会合作，因为它信任特别报告员，而智利驻联合国代表将会在纽约为此而发表声明。Volio 教授问他的工作是否必须等待Daza 大使作出声明以后才进行。Calderon 大使回答说并非如此，合作当时就恢复。其后，特别报告员提出某些关于其任务规定的问题，特别是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例如，他重申他在报告中所说关于报刊情况的话。他认为报刊的情况特别危险，因为智利政府在它认为报刊的活动超越了它规定的限制的时候，可能和曾经对传播机构采取了镇压措施。他又提到国营电视也许可以充当同反对派进行讨论或政治辩论的论坛。Calderon 大使的回答大意如下：关于特别报告员所说报刊的危险情况，直到最近为止，政府曾经在源于紧急状态和宪法授予的暂时权力的基础上对报刊采取了Volio 教授提到的行动。从今以后，将会对报刊采取司法行动，从而减少政府采取主观或任意行动的范围。关于在电

视上进行政治辩论，这种辩论已经在电视上成功地举行。关于言论自由的一般情况，反对派有42个电台，而只有一个政府电台；同时还有12份反对派的出版物。特别报告员问及颁布管理国法令的过程，Calderon 大使给他一份宪法基本法令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1986年9月23日国会的宪法基本法令初稿而编写的。大使认为，这表示即将会颁布该法令的最后形式。Calderon 大使又让他阅读侦讯警察局局长根据1988年4月12日基本法令授予他的权力而作出的一项关于警察力量的决定。这份备忘录形式的决定是对全体侦讯警察而发的。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请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避免对任何被侦讯警察扣留或由国家情报中心移交的人采取任何非法胁迫手段的可能性。该备忘录已经传达到智利全国各侦讯警察单位。该决定规定对不遵守者施加刑事和行政惩罚。备忘录也加强了侦讯警察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及内政部人权咨询委员会签订的协议，因为照Calderon 大使说，这些协议规定每天要把被扣留者名单送交这两个机构。特别报告员想解释说，智利当局没有把有关决定交给他，因为按照Calderon 大使的说法，这是由于它是一份“内部和保密”的决定，但是上面所说的是该决定的摘要。当局向Calderon 和Alegria 大使宣读这个摘要，他们都认为该摘要概括了全部要点。Calderon 大使说，智利政府同意在外交部协调下每月同红十字委员会和内政部人权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评价协议的执行情况。这实际上意味着在Calderon 大使本人协调下进行。第一个这样的会议已经在1988年4月2日举行。特别报告员然后提出他到智利进行另一次视察的问题，由于Calderon 大使鉴于要进行全民投票而建议在12月的一个日期，他首先强调他不会以观察员的身份，而是以根据其任务规定以特别报告员的名义前往。Calderon 大使勉强同意如此，又说虽然他不能够及时作出答复，他相信会允许这样做。特别报告员又说他的视察适宜在公民投票前和投票期间进行。Calderon 大使同意这样做，而视察日期将要视智利政府必须作出的公民投票的日期而定。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建议公民投票必须在公众自由或人权获得切实有效保证的气氛下举行。因此必须在公民

投票前解除两个紧急状态，以便在公民投票前、投票期间和投票后形成有助于公民最可能自由参与的气氛。

13. 1988年5月16日，Calderon 和 Escobar 大使访问了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 Jan Martenson 先生，告诉他已经通知特别报告员的决定，该项决定已经由 Pedro Daza 大使在1988年5月13日给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信中正式提出。Calderon 和 Escobar 大使重申智利同特别报告员和人权委员会恢复合作的条件。

14. 因此从上述日期起恢复了特别报告员与中心之间的正式接触。这些接触直到本报告的日期为止，主要让特别报告员继续充当个别智利人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角色，目的在于代表若干需要政府作出好意决定的人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向政府求情。

15. 此外，智利政府在圣何塞和日内瓦通知特别报告员一些重要事件，其中包括削减被放逐者清单以及一些影响智利人安全的政治事件和特别报告员活动的结果。

16. 1988年6月24日特别报告员在为履行其职务而到日内瓦的时候，写信给 Luis Escobar 大使要求让他为了执行其职务而前往智利进行第四次视察。他在信中说：

“由于我必须继续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报告智利的人权情况，我必须正式要求智利政府准许我第四次访问智利，以便能够在同有关方面直接接触下亲自了解情况。正如我在1988年5月6日同 Mario Calderon 大使会谈时向他指出，由于这一次视察将特别考虑到公民投票的举行，视察宜于在公民投票前不久和投票期间进行。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到时我不会作为‘公民投票观察员’前往，而是遵照我的任务规定以特别报告员的身份进行视察。”

17. 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的这一次访问期间告诉了若干如 Juan Francisco Fresno 枢机主教一类智利人士他决定充当智利的特别报告员。

18. 为了编写本报告，特别报告员也请求了一些非官方的可靠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关于智利人权情况的资料。

19. 特别报告员于1988年8月26日到日内瓦进行一个星期的工作，协商和访问，和完成本报告的编写。1988年8月29至31日，特别报告员接待了Mario Calderon Vargas 特别大使，和一位陪同大使的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等秘书。Calderon 在会谈中转交给特别报告员一封智利外交部的信，准许他遵照其任务规定再一次访问智利。会谈审查的事项包括：关于在1988年10月5日举行的总统公民投票的事前保证；新的侵犯人权申诉，其中包括涉嫌在秘密扣留中心进行的酷刑；对一些严重违反人权案件进行中的司法调查的进展情况；智利报刊的情况和若干正在由于涉嫌污辱武装部队而被审讯的记者的情况；关于特别报告员即将访问智利的官方日程安排；和1988年9月2日宣布解除进入智利的行政禁令，这将实际上结束放逐智利公民。

20. 1988年8月30至31日，特别报告员也接见了代表某智利人权组织的一位律师，从该律师获悉其组织对1988年上半年智利人权情况特点的判断。他指出，当局这期间颁布了六项新的秘密法令（第18.683；18.684；18.685；18.686；18.710和18.715号法令）。关于把国际人权准则结合进智利法律的问题，他提到《官方日报》尚未发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未发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酷刑的各项公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关于生命权，他报告说，1988年上半年出现了21宗暴力死亡事件，其中8宗被认为是武装部队或警察干的。对涉嫌因为政治理由而被杀害的人的案件进行的司法调查在查明和惩罚罪犯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关于1987年报告的5宗逮捕和失踪案件，他再肯定这些失踪的确发生了，和采取的法律行动没有取得有用的结果。关于酷刑的控诉，他说同一期间内发生了被认为是国家情报中心，侦讯警察和警察所干的42宗新案件。特别是同公众示威有关的，已经提出了64项关于不必要使用暴力做成伤害的控诉。在这个期间里，1,780人被



逮捕，但只有149人被起诉。关于威胁和恐吓，他代表的组织在同期收到294宗新的恐吓案件的投诉，主要是一个名叫“死亡轻骑兵义勇队”的秘密组织向艺术家，工会领袖，团结共济会和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出的恐吓。关于司法的运作，他强调军事检查官继续施加长期的隔离扣留，而律师为其当事人辩护时遇到许多阻碍。最后，关于言论自由，他表示其组织对军事法典第28条（污辱武装部队）的似乎滥用感到关切。当局以此为根据对反对派记者和新闻机构提起的40宗诉讼尚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21. 最后，特别报告员在1988年9月2日接见了两名马普切“AD MAPU”组织的代表，他们向他申诉关于警察在1988年8月进一步袭击Miquihue 和 Choque（阿劳科）和Purrume（考廷）社区的事情。这些袭击源于关于划分印第安人土地的第2568号法令的执行。各印第安人组织反对这项法令，因为它们认为保存土地对保护马普切人民的文化特征至为重要。

22. 同日，特别报告员又接见了“民主智利”组织的一名代表。该代表提出其组织对举行总统公民投票的各项事前保证的看法。他特别说，反对派处于不利的地位，16个现有政党只能使用13%拨供竞选宣传用的传播空间。他又要求政府保证在公民投票前的运动里可以公开和自由地发表反对派的政治意见。

### 三、关于侵犯人权的控诉

23. 本节所载资料并不一定要当作执行法律的各级法院经过调查的事实，也不一定反映着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而且，必须铭记着，正如以前一样，特别报告员于1988年9月2日将这些控诉提交给智利政府，同时表示他非常关切。然而，特别报告员在达到他认为有根据的结论时，将在其他场合提出他的意见。无论如何，本报告所载各项结论和建议并不是以下列控告为基础的。

24. 这些控告按下列顺序说明，并受上述保留的限制：

- A. 生命权
- B. 身心不容侵犯权
- C. 自由权
- D. 安全权
- E. 获得正当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
- F.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
- G. 自由进出国境权

#### A. 生命权

A.1 Hernán Elías Chamorro Monades. Marta Maldonado Vera 于1988年6月28日向 San Bernardo 刑事法庭提出的杀人控诉中说她丈夫于1973年9月28日被来自 San Bernardo 步兵学校的队伍逮捕，1973年10月3日在这些人手手中时死于子弹所伤。

A.2 Alberto Recaredo Gallardo Pacheco, Catalina Ester Gallardo Moreno, Roberto Gallardo Moreno y Mónica del Carmen Pacheco Sánchez. Ofelia Moreno Aguirre 于1988年6月10日向 Santiago 第二刑事法庭提出的控

诉中报告她丈夫 Alberto、小孩 Catalina Ester 和 Roberto 及媳妇 Monica del Carmen 于 1985 年被杀。Moreno Aguirre 控称她于 1975 年 11 月 18 日与她丈夫、儿子 Guillermo 和孙女 Viviana Gallardo Magallanes 一起被捕。其他家人，包括她女儿 Catalina Ester 和媳妇 Monica del Carmen，也于同日被捕。她们都被用属于调查警察的车带到位于 General Mackenna 街（路）的警察营房。她们被拘留在该地的期间都受讯问并受到残酷的待遇。被捕第二天，原告及某些家族获释。后来原告接到通知说 Roberto Gallardo Moreno 于 1975 年 11 月 17 日在第 51 号学校的冲突中死亡，她丈夫、女儿及媳妇将移交给国家情报局。数小时后，国家情报局发表了一份新闻稿说，原告的丈夫、女儿和媳妇死于“极端主义者”与国家情报局和调查警察之间的冲突中。据 Moreno Aguirre 称，官方的报道不可信，不仅因为这些死者在死亡前不久仍受调查警察拘禁，根本不可能逃逸，而且这三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适合参与任何武装冲突。当时她丈夫已 65 岁，媳妇有孕，女儿正在喂她 3 个月大的孙子。

**A.3 Roberto Eliecer Valdebenito Vera.** 1988 年 3 月 29 日，Caranilahue 刑事法庭接到对 Valdebenito Vera 施加不必要的暴力使其致死应该负责人员的控告。原告称 3 月 9 日晚上约 12 时 30 分，受害者正要回到他在 Javiera Carrera 贫民窟的家，他看到路障并决定走近去看看。有人正在游行示威纪念国际妇女节。几分钟之后，满载警察的中型车驶过来，向贫民窟住民开枪射击，射伤了 Roberto Valdebenito 的头部。同时，Oliverio Montes 挨打并被捕。警察未帮助受伤者便驾车离去。受伤者先被送到 Caranilahue 医院，后来被转到 Concepcion 医院，1988 年 3 月 10 日就死在那里。

**A.4 Francisco Villalón Pérez, Claudio Paredes Tapia 和 Nelson Garrido Cabrera.**

1988年2月11日，很多人要求 Santiago 上述法庭任命一名特别调查法官以调查上述青年学生的死亡。这些青年人于1988年1月31日位于 Santiago Estacion Central Commune 的 Villa Portales 的一家公寓发生爆炸时死亡。根据调查警察对该事件的初步报告，有三名“极端主义者”正在处理爆炸物时死亡。据报这三名“极端主义者”为 Waldo Ramirez Venegas, Claudio Paredes Humberto Durán。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战斗阵线”声称这是他们干的。

有一名证人说，在爆炸发生之前，他曾看到一些陌生人身穿便服袖上缠红布，要求他和其他的人自报身份，然后威胁他们离开该地区。同一证人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人留在发生爆炸那栋楼房的第一楼。原告指控称，有其他情况指向，这是一件杀人案而不是意外事件。第一，安全人员到达现场的速度。第二，试将本事件同早几天前发生的 Carbineros Major Benimellis 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企图。第三，在完全被毁的公寓里，除了武器以外还有左翼革命运动的旗子被发现完整无损这事实。房东说，他从未在该屋子里见过旗子或武器。第四，依照官方说法，“极端主义者”在处理炸药时发生爆炸，却因死者的手完整无损所以认得出是谁这个事实。第五，受害人之一的朋友，曾亲眼看到该事件发生的，住在 Villa Portales 的两个人已经失踪。

A.5 Martin Alejandro Oyarce Guarda. 他的父亲向军事检察官控告应对向他使用不必要的暴力致使他死亡负责的警察。Martin Alejandro、他的弟兄和两个朋友于1988年7月23日清晨3时左右站在街上谈天。当他们看到警察的中型车驶来时，Oyarce Gurda 弟兄便跑走。当他们正在被追时，听到一声枪声，之后 Martin Alejandro 被警察抬起，放到车上。死亡证书上的理由是“腹部和胸部受伤。”

## B. 身心不可侵犯权

B. 6. Enriqueta Yao Moreno。 Yao Moreno 于1988年1月22日向圣地亚哥第三刑事法庭提出刑事控诉，控告侦辑局殴打调查小队成员在她1987年8月被拘留时对她进行非法胁迫。 控诉人称四名武装人员于1987年8月3日突然搜查了她的住宅，他们说他们是侦辑局的。 在控诉人要求看搜查证时，他们拿不出主管当局发给的搜查证。 她声称她及两个孩子以及一个孩子的朋友 (Ingrid Garces) 一同被带到 General Mackenna 警察总部，然后将她的头罩住，并对她进行审问，同时猛击她的头部和腹部。

B. 7. Horacio Diaz Trujillo。 Diaz Trujillo 现为圣地亚哥公共监狱的犯人，他于1988年1月26日向圣地亚哥第九刑事法庭对犯有擅自逮捕、非法胁迫并给他造成肉体伤害罪的人提出刑事控诉。 他声称是在街上被带有大量武器的平民逮捕的，他们打他，侮辱他，强将他推进一辆货车。 随后，他被带到一个私宅，看上去没有家具，他们在那里审讯他，并威胁他说如不合作，就拷打他的家属并杀死他。 他说在被扣留期间他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他们一再将他的头强按进装着尿及其他物质的桶内，差一点将他淹死。 他被这样整了好几次。 他还说他们对他使用电刑，他还遭受模拟处死。 他们将他关押十天不准同外界联系，其后将他带到一个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个记录他说话的书记员威胁说，如他不合作，就对他的家属进行报复。

B. 8. Cecilia de las Mercedes cid Espina。 Cid Espina 于1988年2月向 Aguirre Cerda 第九刑事法庭庭长对使她在1988年2月初被拘留期间遭受非法胁迫和骚扰的侦辑局警员提出刑事控诉。 控诉人称，1988年2月1日，她和她的兄弟 Oscar 被侦辑局警察逮捕，在遭殴打和侮辱后被带到 Gran Avenida 公共汽车第11号站附近的警察营地。 她在那里被审讯了两天，她的脸被蒙上，一再挨打受威胁。 显然，她两次被迫脱去衣服，并受到性凌辱。 在她赤身裸体时，对她的乳部和双脚使用电刑。 最后，她说她被迫签署了一份不允许她看的文件。

B. 9. Mauricio Alejandro Bello Cortes (第66-88号案件)。他在代他向 Aguirre Cerda 上诉法院院长提出的一份保护申请中声称，他遭受不认识的人的非法胁迫，他们于1988年2月11日在 Lapintana 市政厅前劫持他。在将他扣押约半小时后将他释放。

B. 10. Miguel Silva Acuna 和 patricio Oros Gallardo。Silva Acuna 和 Oros Gallardo 于1988年3月10日向 Aguirre Cerda 第一刑事法庭庭长对犯有1979年2460法令第19条规定应受惩罚的罪行的侦辑局警察提出控诉。他们在控诉中声称1988年3月2日侦辑局警察来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将他们带去发表警察为他们写好的声明。这些警察用侦辑局的车辆将他们带到位于 Gran Avenida 的第11 1/2 公共汽车站的警察营地。他们在那里被剥光了衣服，捉拿他们的人给他们上电刑。随后，他们在进一步遭受酷刑的威胁下，签署了自我牵连的声明。

B. 11. Virginia Yolanda Muñoz Matamoros。她于1988年4月22日向 Aguirre Creda 第四刑事法庭对犯有劫持、非法逮捕和酷刑罪的人提出刑事控诉。控诉称1988年4月1日，许多带有武器的平民进入她的家，既不说明他们的身份，也不出示搜查证。她和五岁的女儿被从住宅带去，并将女儿和她分开。第二天她的女儿被送回家中。Munoz Matamoros 在被劫持期间受到审讯，并受到种种威胁和殴打，并被迫签署了一份她看不懂的声明。

B. 12. Ernesto Jeria Salins。他于1988年4月11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检察员办事处对第12警察分局的警察使用酷刑、非法进入住所和损坏财产提出刑事控诉。控诉人声称他和他的兄弟 Juan 于1988年4月2日被警察在检查一辆小型公共汽车时逮捕。这些人强行进入他们的住宅，非法进行搜索，并在第12警察分局审问他。在审问期间，他们对他施行了好几个小时的电刑。他声称他的兄弟 Juan 也受到酷刑。

B. 13. Manuel Antonio Ortiz Lecaros . 他于1988年4月22日因受伤向 Aguirre Cerda 第一刑事法庭提出控诉。他声称他于4月8日在家中被带武器的平民逮捕，他们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他被带到第12警察分局，并被关了7天，然后移交第二军事检察员办事处处理，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他在警察分局期间受到胁迫，粗暴对待，包括对他身体各部位施行电刑，打耳光，以及用钝器打击他的身体。他称他身上仍带有受打击的痕迹。Ortiz Lecaros 于1988年5月2日向第一刑事法庭提出的刑事控诉中重申了他的说法，并补充说在他被拘留期间，他的母亲得不到他的去向的任何消息，于是代他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但没有任何积极效果。

B. 14. Rosa Estela Correa Herrera. 她在1988年5月5日向圣地亚哥第十七刑事法庭提出的刑事控诉中称，她的家被搜查，她本人于1988年4月13日被拉佛罗里达第三十六分局的便衣和警察逮捕。控诉人是一位77岁的妇女，患有高血压症，风湿性关节炎和糖尿病，她遭到紧张的询问，并被迫坐在椅子上过夜。她被释放后受到一个星期的软禁。无论是抄家、逮捕及其后的软禁都是在逮捕她的人没有出示主管当局发出的采取这些行动的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发生的。

B. 15. Rosa María Olivier Manríquez. 她于1988年5月4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五刑事法庭对一个身穿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提出刑事控诉，她在控诉中称身受严重伤害。据控诉人说，1988年4月20日她沿着 Alameda Bernardo O'Higgins 走时，看见一个年约30岁穿便服的人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的颈子。围观的人群开始朝那人喊叫，要他放开年轻人，这时那人拔出枪来朝他们开火。控诉人离攻击者很近，感到左手受到猛击，并始大量流血。伤是由一颗子弹造成的，子弹打折了她的左臂。随后，控诉人获悉攻击者可能是 Alessandri 地方警察分局的警察 Carlos Poblete C 4月22日她被召到第二十一警察分局去询问她关于这一事件的情况，并告诉她正在进行内部调查。

B. 16. Marcos Villanueva Vinett. 他于1988年7月7日向 Aguirre Cerda 第一法庭庭长对受到粗暴对待提出控诉。 他称1988年4月26日清晨4时许,第十二警察分局的警察包围并搜查了他所居住的 La Victoria 棚户区。 他和棚户区的另一些居民被带到第十二警察分局,那里他受到审讯,同时身体受电刑;他还声称他受到行刑队的模拟枪决。最后,要求他签署不许他看的一份声明。

B. 17. Roberto Marcelino Jerez Campusano (第1041-88号案件)。 他于1988年5月13日在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指责警察不必要地使用暴力造成严重伤害。 他称1988年5月11日晚上约10时30分在他返回家途中被乘坐公共汽车的警察突击队的成员阻拦并逮捕。 他坚持说是在周围环境很安静,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挑衅举动的情況下被逮捕的。 他周身各处都遭重打。 他和其他被捕者一同被带到 Juanita Aguirre 地方警察分局,在那里他被告知他因妨害治安而被拘留。 后来他被释放。 由于挨打,他去医务所就诊, Hernán Varela Jeraldo 医生鉴于他多处受伤和背脊可能挫伤,建议完全卧床休息。

B. 18. Jaime Antonio Cubillos Soto, Yachyn Cubillos Soto y Rodrigo Jabalquinto Ramírez (第655-88号案件)。 Jaime Antonio 于1988年6月7日根据 Godoy, Nelson 等人的申请宪法权利保护书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控诉。 Cubillos Soto 在控诉书中说,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 Rodrigo Jabalquinto Ramírez 于5月28日星期六被警察逮捕,警察没有出示主管当局签发的逮捕证。 他们被带到第二十六警察分局,控诉人在那里被关到下一个星期三。 Cubillos Soto 坚持说,在他非法被捕时以及到达警察分局后,他身体的各部位都受到殴打。 控诉人称他后来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并被迫坐了24小时。 他称声在6月30日便衣警察审问他时,对他的双手施行了电刑。



B. 19. José Armando Muñoz Ramírez 他于1988年6月16日向圣地亚哥第八刑事法庭指控警察非法逮捕, 使用酷刑造成伤害以及非法搜查他的家。他在控诉书中称1988年6月10日三名穿便服带武器的人强行进入他家, 说他们是警察, Muñoz Ramírez 被带到位于5254 Gran Avenida José Miguel Carrera 的警察分局, 他几次被迫脱去衣服, 裸体受审问, 同时他的双手和太阳穴受电刑。电刑施行了两次, 每次15至20分钟。他还声称他挨打, 受到威胁和侮辱, 此外, 身体各部位受到烧灼。Muñoz Ramírez 被释放后去 Barros Luco 医院检查, 医院发现他受有较严重的伤, 胸部受伤, 身上有烧伤。

B. 20. Gerardo Alberto Díaz Sepúlveda 他于1988年7月11日向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控诉无端的暴力行动。控诉人是一位漆匠, 他说1988年6月30日下午7时45分, 他正沿着 calle Santa Mónica 走时, 被警察突击队成员用一种橡皮鞭子猛击脸部。警察当时在追捕几名参加示威的青年。受害者称他和青年人无关, 而且他还特别注意不跑, 以免把他认作其中之一。可是, 他的肩突然被人抓住, 并受到猛击, 以致处于半昏迷时丢失了所有证件。San Juan de Dios 医院将他头部因挨打而受的伤缝好。

B. 21. Carlos Patricio Cid Báez 他的母亲于1988年7月20日向圣地亚哥第六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控诉使用暴力的警察无端使用暴力, 造成严重伤害。控诉人称1988年7月8日晚上约11时30分, Carlos Patricio和他的兄弟以及四个朋友在其中之一在 Santa Olga 棚户区的住房前喝酒聊天。就在这时, 警察的两辆巡逻车, 其车牌号为RP-379和RP-297号开过来。看到车过来, Carlos Patricio 离开他的朋友, 躲进邻近的一个屋子里, 但被警察强暴地抓住。其他人也被捕。他和其他人被带到 Santa Adriana 地方分局, 那里当着他兄弟和其他人的面他被痛打。他们于凌晨1时30分被释放。警察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指控6人在大马路上喝烈性酒。由于挨打造成疼痛, 只好带Carlos Patricio 去 Barros Luco 医疗就诊, 他因动脉破裂内出血而不得不紧急接受手术。对他的诊断是“腹部受伤并发症”。

C . 自由权

C.22 José Agustín Fuentes Vidal (第34-88号案件)。据以 Fuentes Vidal 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于1988年1月11日在 Quinta 标准公社的侦缉局被捕，当时他按照稍早收到的传票前往报到。他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交给法官审理，而且当他的太太询问他的下落时，她得到的答复是，该局并无此人。

C.23 Patricia Roxana Depueto Sáez, Américo Depueto Sáez 和 Américo Depueto Ordenes。据 Patricia Roxana 和 Américo Depueto Sáez 的母亲和 Américo Depueto Ordenes 的太太于1988年2月3日向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Patricia Roxana 于2月3日被身着便衣的侦缉局和国家情报局人员闯入 Depueto Sáez 家里搜查她的父亲和哥哥。在搜查时，警察拿走身份证明文件和属于她家的28,000比索。他们也造成财产损失。他们从未出示搜查令和逮捕状。

C.24 Sergio González Torres. Troncoso Vargas Víctor Hugo 于1988年2月29日以贫民窟 Dávila 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González Torres 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申诉书所述，申诉人于2月28日在通衢大道被警察毫无理由予以逮捕，因为他没有从事任何足以证明应剥夺他自由权利的活动。

C.25 Liliana del Carmen Montenegro Rebolledo. Montenegro Rebolledo 在对那些对犯了任意逮捕、非法进家和虐待罪行的人提出刑事控诉时强调，携带手枪和机枪、佩带红色臂章的便衣人员，于1988年3月31日清晨6时进入她家。这几个人造成物质损失并将申诉人逮捕。他们既没有出示搜查令，也没有出示逮捕状。Montenegro Rebolledo 强调她是被带走的，并且受到盘问、威胁和烤打。

C.26 Víctor Herrera García 他于1988年5月1日向圣地亚哥第十八刑事法

院对犯了任意逮捕和非法进家负责的人提出控诉。 申诉人强调，他家于1988年4月12日下午12时30分左右被特种警察部队和武装便衣人员包围。 一批七人强迫进入他家，没有讲明身份，也没有出示任何令状。 家里被彻底搜查，搜查时他在枪口威胁下被迫俯卧地上。 然后，被带至第七派出所，警方告诉他，他将以嫌疑罪被拘留。 下午2时左右，他被无罪释放。 申诉人最后强调，在他被捕之前不久，他正下班回家，当时他的邻人OSVALBO CELIS已在监视他。 这名邻人是个警察，稍早时曾威胁要以他未犯过的罪行报警。 他说，他以前曾经同CELIS有过私人纠纷。

C.27 Julio Peralta Barahona, Horacio Zea Escobar 和另外六人(第500-88号案件)。 1988年5月2日以八名公民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对警方提出了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 据申诉书所述，申诉人于5月1日在参加一次由全国劳工指挥部举办的纪念国际劳工节的活动之后被捕。 这次活动事前经有关当局核准。 这些申诉人被逮捕时，根本没有从事任何非法活动，也没有不当行为。 进行逮捕的人，既没有出示任何文件、法令或逮捕状，也没有说明逮捕的罪名。 被捕者在被逮捕时以及在第十二分局都遭受毒打。 他们先被关在第十二警察局，然后移送第三警察局。 据司法院法医处的Victor Velásquez Villalobos医师的报告所述，在被捕者中有三人受伤。

C.28 Claudio Antonio Aravena Baeza Manuel Castañeda Martínez (第507-88号案件)。 上述二人的亲属于1988年5月3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对警方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控告警方非法逮捕。 这两名公民均于1988年5月1日在纪念国际劳工节的活动之后被捕。 申诉人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也没有犯任何罪行，被捕时没有看到有关当局的令状；他们在被捕时以及在被押到第十二警察局时，均受到烤打。 在申诉书提出后获悉，申诉人被拘留的罪名是违反了内政部1988年5月1日第6708号豁免令下的国家安全法。 CASTANEDA MARTINEZ 在被拘留的五天期间被禁止与外界接触。

C.29 Raúl Hernán 和 Miguel Angel Cárdenas Alvarez (第142-88号案件)、Ruth Cabrera Hinostraza (第159-88号案件和军事上诉法院第578-88号案件)、Virginia Yolanda Muñoz Matamoros (第347-88号案件)、Cecilia de las Nieves Novoa Carrasco (第354-88号案件)、Raúl Armando Fiqueroa Guajardo 和 Marcos Guajardo Morales (第361-88号案件和军事上诉法院第678-88号案件)、据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于1988年5月16日向圣地亚哥和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及军事上诉法院提出的书面诉状所述, 上述公民均于1988年头几个月被捕, 拘禁于秘密拘留地区。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强调, 这种作法严重地违反了《宪法》第19条第7(d)款的规定, 并且与尊重人权背道而驰, 因为按照规定, 拘留时间只能将拘留犯关在他家里, 或关在一座监狱, 或关在他被捕后立即送到的公共拘留地区。再次出现秘密拘留地区助长使用酷刑之风。

C.30 Miguel Arriagada Ramirez 和另外46人(第306-88号案件)。1988年5月26日以 Villa Venezuela 贫民窟47名居民的名义向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对侦缉局、警方和国家情报局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申诉书所述, 5月26日清晨进行逮捕, 当时实际上对整个 Villa Venezuela 贫民窟进行搜查。逮捕行动由便衣人员进行, 他们既没有说明身份, 也没有出示逮捕状。还有军事人员从旁协助。被捕者于当天下午获释。

C.31 Corina del Carmen Vásquez Ramirez, Orlando Francisco Vásquez Ramirez 和另外一些人(第302-88号案件)。1988年5月26日 Corina del Carmen 以她本人和她家人的名义向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对侦缉局和国家情报局提出请求宪法权利保护书。其中之一的 Orlando Francisco 已经于5月26日清晨被侦缉局根据内政部第6751-88豁免法令加以逮捕。Corina del Carmen 在其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中强调, 侦缉局和国家情报局人员在她家搜查武器, 他们摧毁了所有碰到的每件东西, 包括门、窗和垫子。入侵者甚至玩弄妇女, 剥光她们的衣服。此外, 她神智失常的兄弟 Humberto 被从二楼扔下楼梯。

C.32 Mauricio Acuña Durán, Marta Aranís Aranís, Sergio Aranís Contreras, Erika Arce Pavez, Matilde Arce Pavez 和另外 16 人 (第 661-88 号案件)。据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中所述,所有申诉人都是 1988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 时左右在 Velásquez 将军路同铁路线交界的地点被捕,当时他们正在举行以尊重人权为主题的和平文化活动。当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到现场时,参加活动者正在绘一幅以人权为主题的壁画,警察将他们和旁观者一齐逮捕。他们先被带到 Lo Espejo 警察局,接着警察和国家情报局人员进行盘问,然后将他们移送第二十一警察局。最后根据发布第 6759 号豁免令的内政部所发的命令将他们拘留在第三警察局。他们于 6 月 2 日获释。

C.33 Cecilia Reyes Rodríguez (第 309-88 号案件)。据 1988 年 5 月 30 日向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申诉人强调,她被大约佩带中饰盾形徽纹绿色臂章的 20 名便衣人员逮捕,他们没有出示任何司法令状。申诉人还强调,这些人使用私家车辆和侦缉局拥有的车辆。他们强行进入她家,一旦进入后,即动手打烂门、窗、椅子、垫子和顶楼。然后,他们把她眼睛蒙着,带至侦缉局的中央兵营。她在兵营里被连续盘问,她在盘问时受到殴打和威胁。

C.34 Alberto Chiang Muñoz y Eduardo Francisco Montecinos Fierro (第 736-88 号案件)。1988 年 6 月 16 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申诉书所述,申诉人(均为智利大学学生)于 1988 年 6 月 15 日被捕,罪名是参加学生组织发起的支持它们要求的和平示威。Chiang Muñoz 先生在他 1988 年 6 月 22 日的书面申诉书中强调,他们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毒打。据内政部说,该部是根据 1988 年 6 月 15 日第 6794 号豁免令进行逮捕的。拘留犯于 6 月 20 日获释。

C.35 Carlos Humberto Rojas Albornoz y Pablo Esteban Aguilera Inostroza (第 751-88 号案件)。Rojas 先生和 Aguilera 先生的太太于 1988 年 6 月 20 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控告警察逮捕她们的丈夫。San Gregorio 第十三警察分局的警察于 6 月 19 日将她们的丈夫逮捕,然后将他拘留在圣

地亚哥第三警察局。他们是在街上走路时被捕，他们没有任何不良行为，也没有犯任何罪行，而逮捕他们的警察没有出示任何逮捕令或逮捕状。两名拘留犯都受到盘问，其中一人遭受殴打和威胁。

C.36 Mario Campónico Susarte, Gustavo Cubillos Rojas, Paulino Díaz Rivera, Guillermo Gómez Tapia, Juan Lasen Pino 和另外 12 名学生 (第 756-88 号案件)、据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这 17 名学生都是在 Blas Cañas 职业培训所上学，他们是于 1988 年 6 月 21 日在参加一次支持他们要求的罢课行动后离开培训所时被警察逮捕。他们都被带到第三警察局，其中唯一的女学生被带到 Dávila 分局。

C.37 Marco Antonio Lagos Casas-Cordero, Paulina Nova Contreras, Claudia Lagos Nova y Silvia Llantén Saavedra。Lagos 向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法院提出申诉书，控告警察犯了非法进家、非法逮捕、破坏和偷窃等罪行。他强调，在他家处理家务的女佣人 Silvia Llantén Saavedra 于 1988 年 6 月 22 日在送他的小女儿上学时同她女儿一道被认出属于警方的便衣人员逮捕。申诉人的太太在 Silvia Llantén 和他的女儿 Claudia Lagos 被捕数分钟之后也被捕。申诉人本人于一小时后被捕。在进行这些逮捕行动时都没有出示任何逮捕状，也没有给予任何逮捕的原因。Lagos 的家被搜查，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通向顶楼的通道被毁，浴室和厨房楼上的磁砖被拿下，排水系统的盖子被打坏，后院通道的石块被砸碎。参加搜查行动的某些人员还把 Lagos 的工具顺手拿走。申诉人经过严密盘问后于次日获释。他的太太、小女儿 Claudia 和女佣人 Llantén Saavedra 在前一天仅在他们被非法逮捕数小时之后获释。

C.38 Marcelo Abrigo Parra, Marcela Acevedo Medina, Eduardo Acuña Cataldo, Alvaro Acuña Vercelli, Daniela Ahumada Araya 和另外 190 名学生 (第 790-88 号案件)。据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1988 年 6 月 27 日圣地亚哥职业培训所当局召来警察制止和平的学生示威，以致 190 名学生被捕。示威的目的是要促使校方和教育当局注意减税率减少、基础设施的问题、缺乏图书馆和卫生设施、中止直到示威时一直由智利大学医疗中心提供的医疗

服务。男学生被带到第三警察局，女学生被带到 San Cristóbal 分局。其中 24 名拘留犯在 6 月 30 日前获释，154 名被拘留 5 天，12 名于 1988 年 7 月 2 日上午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其中一名申诉人当天无条件获释，其余 11 人于三天后获释。

#### D. 安全的权利

D. 39. Rene Miranda Barrales. 他母亲在提出宪法权利保护令的申请中说，警察通缉他的理由在 villa Portales 公寓发生三名青年遭爆炸死亡案的现场拾到写有他的名字的 1986 年大学身分卡。申请人的母亲说，这件事十分奇怪，因为她儿子已于 1985 年被智利大学开除。

D. 40. Reinaldo Oscar Flores Morales. 1988 年 2 月 28 日申请人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申请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令。他曾任 Hogar de Cristo 造房公司工会主席，于 1987 年 3 月被公司开除。不久复职后，他又因据称的与左翼政党有联系而遭到雇主威胁。1987 年 4 月 30 日，他一度遭到绑架的企图。他终于离职，但威胁仍然不断，终于逼使他先离开圣地亚哥而后离国。1987 年 11 月回到智利，他又受到几次威胁，使他再度离开圣地亚哥。发于这种情况，他决定寻求终止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保证。

D. 41. Guillermo Antonio Pavez Guerra (第 27—88 号案) 1988 年 1 月 26 日以他的名义向上诉法院 Aguirre Cerda 院长申请宪法权利保护令的申请书中说，Pavez Guerra 于 1988 年 1 月 24 日被几名从一辆无牌照工具车中出来的身分不明者逮捕。这次逮捕没有任何人出示逮捕状，只因为申请人斥责了一些不相识的人，他们正在 Madre de Dios 区教堂正门上纪念 André Jarlán 神甫的壁画上涂画。申请人在向法院提出的申请书中说：他在被拘禁期间曾受审讯，审讯时他双手被绑挨打，逮捕人威胁要杀他。

D. 42. Saul Barzilla y Elgueta Matamala 1988年2月10日，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令的申请书中说，当军事检查官 Fernando Torres Silva 到达康塞普西翁市的时候，申请人是该市居民。1988年1月27日，国家情报局成员开始有系统地跟踪他。这些武装人士乘坐六部汽车经常在他的工作地点或他私人住所附近停驻。

D. 43. Carlos Valencia García, Jeanette Valencia García, Mauricio Andrés Valencia García, Osvaldo René Gallardo y Mario Valenzuela Martínez.

1988年2月12日向圣地牙哥上诉法院提出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令的申请人是 La Bandera shanty 镇第四区妇女联合会的主席，代表 shanty 镇居民，其中两名为少数民族。申请书中说，在1988年1月底和二月初，La Bandera 的居民受到迫害、恐吓，有些被逮捕。一些身分不明人士两度询问申请人及他们的活动，引起他们的安全恐惧。

D. 44. Francisco Marcelo Alea, Nelson Soza, Gonzalo Ode y Owana Madera.

1988年3月7日，他们代表居住在大都会区域的为数约1,800,000人向圣地牙哥上诉法院提出预防性宪法保护令的申请。申请人分别为 CODEPU 青年委员会国家会长，圣地牙哥中学生联合会干事，圣地牙哥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和保卫青年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他们的申请是因为最近数月大都会区域的智利青年常受到国家安全机构和私人帮派组织的各种非法压迫而不受惩罚。据申请书说，这种对青年的压迫，目的是为了受现政府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有害影响打击最重的智利社会的重要部分中立化。他们指出，1987年8月到1988年2月间，发生过对年青人的非法逮捕案932件，绑架案27件，受威胁案173件。

D. 45 Sacerdotes Luis Baeza Torrealba y Raúl Hogervoet von Vliet 神甫

1988年3月23日，以拉利奎亚市圣罗稷索教区教会上述两名神甫的名义向瓦尔帕拉索上诉法院提出保护的申请。两人于1988年1月受到威胁，教堂墙上贴了侮辱他们的口号。2月，一名自称系“反共行动”（智利反共行动）成员的陌生人打电话对他们威胁。3月15日，他们收到一封署名“反共行动”的信。申请人表示，上述团体在当地对许多知名领袖及人士作过威胁，最近之一是向瓦尔帕拉索的200名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威胁。



D. 46. Lorena de los Angeles Nazal Saglie, Gabriela Medina, René Roa, Carla Cristi y Nadia Loyola. 1988年3月4日, 女演员 Lorena de los Angeles 以上述人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要求保护。在申请书中她说, 3月1日她被四个人绑架到一个私人住屋内, 盘问她的艺术活动和她与戏剧界的联系。盘问中不时遭到殴打、威胁和侮辱。她于数小时后被释放。她表示, 她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威胁和恐吓艺术界工作者的运动的一部分。她回顾1987年11月3日, 许多男演员曾接获死亡威胁, 使他们申请了保护(第338-87号案)。但提出这种申请并未使恐吓运动停止, 而正好相反, 收到更多的威胁电话和信件, 有很多男演员遭人跟踪, 住屋被贴上标语——女演员 Gabriela Medina-, 的情形即为如此。12月最后一星期, El Clavo, 剧团成员的 Casa Constitución, 住屋主任 René Roa, 受到威胁, 该剧团成员于11月3日受到威胁。1988年1月24日, 女演员 Carla Cristi 住屋被扔石头, 2月18日, 女演员 Nadia Loyola. 在花园发现一只割断咽喉的死鸽及一封威胁信。所有这些威胁可能来自同一来源, 尽管署名不同, 如“135 Trizano 司令部”或“反共行动”。

D47. Juan Manuel Muñoz Gatica (第295-88号案)。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的申请书中表示, 1988年3月22日, 下午4:30 申请接得匿名威胁电话。一个陌生人自称代表“Yakarta司令部”对他说“你这反政府的虫豸, 小心你的儿子会遭殃”。申请人是一名生意人, 为许多与天主教教会有连系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作编辑工作。

D48. Juan Rafael Alfaro Fuentes (第546-88号案) 在1988年5月1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针对征兵处和国家情报局提出的预防性宪法保护令的申请书中, 申请人表示, 1988年5月9日当他履行兵役义务向昆塔诺莫尔征兵办事处报到时, 他受到平民和军事人员的长时间盘问。后者指他企图渗入智利陆军, 他们指称他与 Villa Portales. 爆炸案中丧生的青年 Claudio Paredes, 有关联。

申请人除被盘问外后遭殴打与威胁。

D49. Rosa Elvira Riquero Nuñez. 1988年5月13日，她向圣地亚哥第十五刑事法院提出控诉，声称遭到非法闯入和搜查。她说，1988年5月11日下午5:40，约有25人的集团强迫闯入她的家中，声称是警察搜查武器。但他们未表明身份也未出示搜捕状。她说，隔邻的四家住屋也被闯入。

D50. Hector René Miranda Luengo (第227-88号案) 1988年5月30日，以他的名义向上诉法院院长 Aguirre Cerda. 提出宪法保护令的申请，其中说他曾在家中被一群配备有调查局警察机枪的平民逮捕。他们总数约有二十人，他们使用的车辆是警车。他们未出示逮捕状，在同一街坊邻舍也发生了同样的突击和逮捕。申请人在1988年5月16日的书面陈述中表示，他于被捕当天下午7:00被释放。他说他在被捕时的车上和拘禁所中均遭毒打，全部过程都被蒙上眼罩。

D51. Bernardo Arroyo Garabito. 1988年6月13日，他向特姆科上诉法院提出宪法权利保护的申请，他说6月8日他收到一封号称“反共行动”(智利反共行动)组织寄来的威胁信。Arroyo Garabito 是教育和社会行动所区域司令并曾创立和平与正义服务特姆科支部。他在申请书中说，威胁信是对反政府者与人权组织有关者恐吓运动的一部分。

D52. Roberto Ignacio Ramírez Valle. 他就1988年6月28日被绑架和非法联系提出刑事控诉。他于事发当日到银行为雇主办事，两个人以威胁方式要他们走。进入汽车后，他们向他详细盘问有关他雇主的活动。在盘问中，他多次被捶击胸筋。约一小时半以后，他被释放，并受到威胁说将很快会有第二次造访。

D53. Pedro Segundo Ortiz Navarrete. 1988年7月22日他向圣地亚哥第二十二刑事法院提出刑事控诉，他说，1988年7月1日和11日他家遭一

伙人非法闯入，来人自称是第0S-7警察队和调查局警察的成员。由于第0S-7警察队否认曾对控诉者或其住宅进行过任何询问，控诉人恐怕会有第二度无司法搜捕状的突击行动。

D54. Isaías Libertario Duque Jorquera 1988年1月29日，针对 Cisterna 市长，他向上诉法院院长 Aguirre Cerda，提出保护的申请。说，1987年9月14日他被户长职业署开革，开革理由与他的能力或业务适宜毫无关系，他于1988年1月22日提出复职的要求也被以同样理由驳回。他表示，这是对他武断的就业歧视，不但违反宪法和侵犯他的权利也破坏了他家庭的实质和心理完整，因为他陷于失业而无法养家活口。

D55. Mónica Emilia Alvarado Hinojosa 1988年2月26日，她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申请预防性宪法权利保护令，因他自1987年11月24日结束放逐回到智利以来即遭到各种骚扰。她说，虽然她是合法地回国，警察在机场即拿走她的手提包。除其他外，她的手提包内有\$1,005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给她和她孩子们的遣返费。她又说，1988年1月6日以来，她遭到一辆汽车的不断跟踪，使她担心自己的安全。

#### E. 获得公平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

E. 56 Nelson Donato Guzmán, Manuel Rodríguez Fuentealba, Lindor Ruiz Barriga 和 Florisondo Trocoso Puente (第16,374-2号案件)、Luis Walter Valdes Pulgar (第14,901-2号案件) 和 Luis Enrique Silva Rojas (第16,358-2号案件)。上述人士各针对应向彼等被逮捕后被非法胁迫负责的国家情报中心职员提出控诉。

针对第二军事法庭就正在审理这些案件的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异议，说这些案子应由军事法庭审理，所有三案的律师提出下列理由：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该刑事法庭有权审理这些案件，因为这些案件发生在该法庭的管辖区内。民事法庭至少有权进行初步调查，以便除其他外，决定国家情报中心职员是否应对所指控情事负责，如果是，又是那些人。但到目前为止，未能这么做，理由是警察和国家情报中心不合作，他们拒绝到民事法庭出庭。第二，即使进行胁迫者已经证实为国家情报中心职员，军事法庭也无权审理这些案件，因为根据宪法和智利法律，国家情报中心并不属于武装部队。最后，要求宣布民事法庭无权审理这些案件所根据的论点是，这些军人被告是在执行职责时这么做的。根据军法第421条，及第5条(3)款和(7)款，被控告的行为不能算是在执行职责时所采行动。

E. 57 Mario Vega Varas，1988年5月17日，他的律师代表他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对负责审理第1,797-86号案件的军事检察官 Fernando Torres Silva 适用人身保护法。这位律师在上诉书上说，委托他上诉的人连续40天被禁在独房里，显然违反了现行诉讼法。

E. 58 Godoy, Nelson 和其他人 (第655-88号案件)。他们是被捕后依内政部第6067号例外法令照一般情况监禁的。然而他们的律师在1988年5月31日向 Santiago 上诉法庭提出的书面里说，他们被监禁在独房里，不能见访客。

E. 59 José Galiano, Carmen Hertz, Sebastián Hamel, Alberto Espinoza, Carlos

Margotta 及其他人。这些律师和11个同事行使宪法所规定的上诉权，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求，要求纠正并管制第二军事法庭和在它管辖下的特别军事检察官办事处职员行使某些权力，这些人侵犯案件当事人的各种权利并妨碍律师行使其职权。请

愿人称，刊登在1988年4月30日 *Diario Oficial* 上的根据国防部第42号最高法令设立的三个正式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以及现有的三个军事检察官办事处（都属第二军事法庭管辖），都设在 *Providencia. Antonio Varas 1562* 号的陆军电信学校校园里并在那里作业。特别军事检察官 *Fernando Torres Silva* 上校的办事处也仍旧在 *Zenteno 102* 作业。

根据请愿书，各军事法庭由重武装的警卫严密守卫着，因此每次访问军事检察官都无可避免地感觉到这种夸耀武力所带来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某些职员故意夸示火器以及玩弄这些火器的态度也引起人的关切。而且，一般群众和律师到这些办事处的时间一天只限于一小时。军事检察官拒绝听取律师发言，要不然就是托辞有事无限期拖延。他们的办公时间不考虑任何紧急情况或例外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当事人有无可弥补的损失。同时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在办公时间以外拒不接受文件。

请愿书还提到关于遵守下判决和通知判决的时间限制上的许多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下判决时律师必须到场，并亲自接受通知。囚犯、被告、证人、亲戚和律师，也显然越来越不受尊敬。军事法庭的某些事务员非法地执行个人的职责，使用不尊敬对方的语气，有时甚至使用令人生气的语气进行盘问。虽然有士兵在，受押者和囚犯们还是被手拷脚镣。对待证人据说有双重标准：如果他们属于安全人员，他们可以不慌不忙，并且受到一切优待；“疑犯”的证人，正相反，必须无止境地出现在法庭，从来不知道自己跟案件的进行有多大关系。军事检察官在新闻媒介出现时尽侮辱被告之能事，指其为恐怖主义分子，犯了虐待和不尊重被告和保证公平审判的过错。

请愿人还提到适用现行法律时的一些问题。他们建议最高法院应该注意下列事实：刑事诉讼法第109条和军法第135条规定，法庭不仅必须调查各种事实和情况证实被告有罪，而且还须证明被告无罪或情有可原的情况。请愿人还指出，正如宪法第19条第(3)(6)款所规定，法律都不能不可辩驳地假定犯罪责任，更何况司法人员怎能对囚犯和被告表示偏见并轻视他们。

第二军事法庭法官于1988年8月8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书面声明里反驳请愿律师们所有的指控说，各军事法庭都严格遵照现行法律办事。他说：“在本军法官认为，胆敢向有法律根据的权力提出质疑，实系在请愿书上签名诸律师狂热过份”。他接着说，“坚持这一点，将意味着有意改变现行立法，这些律师没资格改变现行立法”。最后他说：“如此谬误地指控军事法庭及其所属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在行使上述法庭文书明文规定的职权时有违法失职并侵犯案件当事人各种权利，无疑等于作出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可能会有法律后果的指控；无论如何，一点也不表示在请愿书上签名各律师有意同司法系统合作。

然而，Alberto Coddou 博士和 Sergio García 博士应智利律师协会的请求进行的调查证实上述指控确实有根据。1988年8月2日，智利律师协会主席向最高法院院长提出那两位律师根据他们当天访问位于 Antonio Vara 1562号的电信团房舍内的各军事法庭以及律师协会某些资深成员所提供的证据编写的一份报告。律师协会主席的信还载有一些建议。该信指出，把军事法庭设在军队的一个团的房舍内是“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以管理军营的规则和习惯来对待律师、被告和证人，这种待遇跟法庭应有的待遇截然不同。”律师协会的信说，律师们所受待遇，鉴于律师的地位应受的尊敬，对律师而言是极其不合适的。”

Coddou 博士和 García 博士所进行的调查证实有如下在手续方面的问题。在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第630-83号案件的审判前手续在1987年12月21

日结束，在记录上这项通知已于同一日发出，然而处理这个案条的律师说他从未收到任何这类通知。关于查阅文件收发簿上邮件收发登记请求被拒绝，理由是该收发簿仅供内部使用。在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关于跟检察官讨论第2300-86号案件的请求被驳回。在同一办事处，由 Raquel Mejias 律师提出的，经过该办事处盖过章的有关第1363-85号案件的17页文书，并未加到该案件档案夹里，也未就这些文书作过任何决定。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接到关于第1296-87、第1297-87、和第2046-86号案件档案的请求，当发现这些案件尚未指定给该法庭任何事务员时，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律师协会就各军事法庭的作业向最高法院提出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应该有听取律师辩解的一定的时间，目前的时间安排应于延长，律师提出请求时，应该能与检察官见面；律师应该受到律师应受的尊敬；应该有一个办公室在聆听的时间之外也可以收纳文书；检察官办事处一收到案件，应该在该办事处内指定负责的事务员；律师应该有权调阅文书邮寄登记簿；律师及其他获授权人员应该随时可以调阅案件档案；保存这些档案的地方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督。

E. 60 José Galiano, Consuelo Gil Bessolo, Carlos Margotta, Alfonso Insunza Bascuñán, Roberto Garretón Merino 及其他人。 这些律师及其他九位律师在他们针对法官对 Santiago 第二十刑事法庭 René García Villegas 法官提出纪律诉讼（第PR4691号行政案件）一事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文里同意 García 法官所写判决书的内容，即“军事法庭对有关指控国家情报中心工作人员实施酷刑犯罪的调查，从来没有结果”。这是 García 法官所写判决书的一部分，曾引起一名军法官对他提出规律控诉。上述律师们支持 García 法官的意见，提出由军事法庭从事调查的指控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施行酷刑的48个案件作证。在第一次提出这些案件数年之后，有些案件仍在审判前阶段，未曾进行过任何有用的调查，或有过什么结果；其他案件则已销案，未见任何人被判有罪。这些案件如下：

<u>受伤者</u>	<u>案件</u>	<u>检察官办事处</u>
Aguirre Tobar, Paulina Alejandra	346-85	第二
Allende Bravo, José Miguel	1445-86	第二
Blanchet Muñoz, Raúl	17-85	第二
Contreras Grandón, Rubén Alejandro	1324-86	第二
Delgado Tapia, Ana Alicia	932-84	第三
Drago Camus, Claudia Elena	--	第一
Escobar Cabranza, Ernesto Eduardo	1398-84	第二
Flores Castillo, Raúl Enrique	369-83	第一
Flores Durán, Manuel	263-83	第二
Flores Ramírez, Sergio	928-84	第一
Fonseca Vidal, Ignacio	287-85	第二
Galanakis Tapia, Andrés Nicolás	85-84	第三
Guerrero González, Pablo Yuri	1276-86	第三
Iribarren González, Fernando E.	86-83	第一
Leal San Martín, Rolando Daniel	1078-85	第三
Martín Martínez, Jorge Alejandro	2740-86	第三
Mellado Reyes, Carlos Custodio	287-85	第二



<u>受伤者</u>	<u>案件</u>	<u>检察官办事处</u>
Osorio Pérez, Germán	263-83	第三
Osorno Badilla, Valentín	629-83	特别
Reyes Susarte, Raúl	987-81	第二
Riveros Jara, Sergio Gabriel	287-85	第二
Rodríguez Herrera, Horacio Raúl	1287-85	第二
Rodríguez Herrera, Marcelo Javier	1287-85	第二
Ruiz Moscatelli, Rafael Hernán	85-84	第三
Sepúlveda Toro, Mónica	1398-84	第二
Urbano García, Adán Jesús	2320-86	第二
Vega Poza, Leonardo	1538-85	第二
Zepeda Camillieri, Gustavo F.	85-84	第三
Alvarez Santibañez, Federico	482-80	第二
Arancibia Ordenes, Armando	1881-84	第一
Bravo González, Teobaldo	502-81	第二
Carvajal Belmar, Máximo Gorki	2149-84	第一
Cottet Villalobos, Eduardo	1038-83	第二
Farias Ogaz, Rosa	1455-83	第二

<u>受伤者</u>	<u>案件</u>	<u>检察官办事处</u>
Guajardo Pena, Vladimir	925-84	第二
Guzmán Robinson, Luis	--	第一
Herrera Illanez, Hector Luis	1882-84	第一
Inostroza Marquez, Sergio	--	第一
Manquien Fuentes, Osvaldo del C.	1185-84	第一
Muñoz Altamira, Fernando Antonio	2053-84	第一
Rojas Alvarez, Eduardo René	1899-85	第一
Rojas Zúñiga, Heriberto	925-84	第二
Rosales Chávez, Omar	502-81	第二
Rosales Chávez, Omar	374-83	第三
Salas Montes, Verónica	622-83	第一
Sierralta Jara, Luz María	706-84	第一
Tapia González, Roberto Eugenio	1185-84	第一
Viveros Lagos, Fexi Marcela	1996-84	第一

## F.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

F. 61 Manuel Casanova Azagra. 1988年4月8日杂志《APSI》的总经理代表杂志《APSI》及其雇员 Manuel Casanova Azagra 向 Santiago 上诉法院申请补救保护。他指称, Casanova Azagra 于4月8日为身穿便衣人士所逮捕。他们威胁 Casanova Azagra, 并建议他不要为《APSI》做事, 否则将在他身上发生“不愉快的事”。他们还拿走了一张本来预备作为该杂志下一期封面之用的相片。

F. 62 Isabel Hermosilla Pérez, Eduardo Garretón Suazo 和 Ivonne Constancio Rojas (第757-88号案件)。1988年6月22日, Santiago 上诉法院收到为上述三人申请“人身保护”的请求。他们于6月20日被捕。根据警方称, 他们在公共场所散布主张在国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的政治宣传。都市警察总部1988年6月23日的报告如此记述。

F. 63 军事法院以思想犯罪为由审判记者和反对该政权者。过去几年来有50名以上的人被 Santiago 军事法庭以侮辱武装部队或警察为由付诸审判。这类被告包括由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通常以书面)涉及犯罪而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的记者、律师、教士和政治领导人等。严格的讲, 这些人曾被军事法庭指控、审判, 甚至判决过。

(1) Fernando Paulsen (第1090-86号案件), 是《Análisis》的一名记者, 于1986年2月26日以侮辱警察的罪名被逮捕并交由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审判。该案尚未审阶段, Paulsen 仍在待审。

(2) Enrique Silva Cimma, 急进党主席, 1986年2月27日, 被以侮辱武装部队为由, 交给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加以审判。1987年6月9日, 最高法院取消有关交由该军事法庭审判的决定。

(3) Roberto Garretón 和 Mariana Allendes (第455-87号案件), 是替《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做事的律师。在出版了有关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一篇文章之后, 于1987年5月6日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同年6月, 由于另外一篇文章, Garretón 还得再次在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出庭。军事上诉法庭于1988年5月4日决定维持交给第二军事检察官审判以前决定。该案尚在审判前阶段。

(4) Abraham Santibáñez, Genaro Arriagada 和 Alejandro Guillier, 分别为《Hoy》的编辑、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和记者。Abraham Santibáñez 于1987年5月12日被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传唤。其他两人过了一个月以后被同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传唤。1988年1月27日, 三人皆以侮辱武装部队为由交给法庭审判。1988年5月13日, 军事上诉法庭推翻有关审判 Genaro Arriagada 的决定无效。关于 Santibáñez 和 Guillier 的部分被发回军事检察官办事处继续进行审判前程序。这两人仍在等待审判。

(5) Felipe Pozo 和 Gilberto Palacios (第1173-87号案件), 分别为《Fortín Mapocho》的编辑和记者, 于1987年5月29日交由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审判。最近的初审, 判他们禁锢三年, 暂缓执行。

(6) Alejandro Ríos Valdivia, Víctor Vaccaro 和 Francisco Herrera。  
Alejandro Ríos Valdivia 是历史教员, 曾在 Salvador Allende 总统下面当过国防部长, 于1987年6月24日被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传唤作证。其他两位, 分别为《Cauce》的记者和编辑, 也被传唤到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 理由是关于他们刊登了访问 Ríos Valdivia 的文章, Ríos Valdivia 在该访问文章里讲了对智利共和国总统不恭维的话。1987年9月4日, Ríos Valdivia 被控侮辱武装部队而受审判。

(7) Juan Pablo Cárdenas, Esteban Silva, Jaime Escobar 和 Jaime Martínez

(第562-87号案件)。四人都因1987年3月7日《Análisis》上面所刊登由基督教左党领导人 Silva, Escobar 和 Martínez 署名的一篇文章而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Juan Pablo Cárdenas 以该刊物编辑的身份,首先于1987年6月27日作证。

(8) Alfredo Montecinos, Lautaro Campusano, Pedro Barría, Pamela Pereira, Sergio Corvalán, Raquel Mejías, Carmen Hertz, Hernán Quezada 和 Alejandro González (第2111-85号案件)。都是跟《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有工作关系的律师,因被指控在一封侮辱警察的信上签名而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一切过程仍在审判前阶段。

(9) Patricia Collyer, 《Análisis》的记者,因为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可能应该对1973年10月到12月之间发生的11起射击案负责的人们的事,于1987年7月9日被命令出庭。

(10) Marcelo Contreras, Sergio Marras 和 Fernando Villagrán (第1434-87号案件),分别为《Apsi》的编辑、副编辑和业务经理,被要求就1987年8月9日被没收的一份Apsi特刊事,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1987年9月10日,军事上诉法院维持关于 Contreras 和 Marras 应受审判的决定。经向最高法院上诉后,两人于被押两个月之后获释。

(11) Sergio Marras (第214-87号案件)为《Apsi》副编辑。在另一次控案里,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决定他于1988年4月14日受审。

(12) Manuel Bustos, 全国工人司令部主席,被传唤于1987年9月8日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解释他在《Análisis》上面写的一篇文章和他呼吁全体罢工的一次演讲。

(13) Emilio Filippi 和 Alberto Gamboa, 分别为《La Epoca》编辑和题为《Un viaje al infierno》(《地狱之旅》)一书之作者。曾在《Hoy》专刊上

刊登的该书，描述1973年政变后在国家广场和 Chacabuco 集中营内发生的事情。军事上诉法庭于1987年11月维持关于两人应该受审的决定。1988年5月，最高法院维持关于 Gamboa 应该受审判的原判，取消关于 Filippi 应该受审的原来的决定。

(14) Pablo Azócar 和 Carmen Hertz ，分别为《Apsi》记者和律师。1987年11月，Azócar 因为他在《Apsi》周刊上写的文章在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受审。在上述两篇文章里接受 Azócar 访问的 Carmen Hertz 律师也被传作证，并于1988年8月16日被第四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交付审判。

(15) Patrielio Arévado、Humberto Lagos 和 Arturo Chasón (第157-88号案件)。《Cause》的记者 Arévado，于1988年1月22日被传唤到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就他评论 Lagos 和 Chasón 所著题为《La religinon de las Fuerzas Armadas y de Orden》的文章作证。Lagos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的一名律师) 和 Chasón 也于同日被传作证。该案尚在审判前阶段。

(16) Mónica Gonzales，《Análisis》的一名记者，于1988年2月16日被传到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就她访问 Karin Eitel 事作证。Gonzales 曾因侮辱智利共和国总统而被判罪。

(17) Francisco Herreros，《Cause》的编辑，被捕后于1988年1月29日被传作证。他在作证以后被释放，但是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于1988年3月22日决定他因犯了侮辱武装部队的罪行应该受审判，并把他监禁在 Santiago 监狱，数日后被保释离开该监狱。

(18) Jorge Donoso，曾任《Fortín Mapocho》编辑，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于1988年3月22日，在关于他担任上述杂志编辑期间曾侮辱武装部队一事的审判中判他监禁60天，暂缓执行。

(19) Tomás Moulián (第267-88号案件) 为作家, 教员、社会学家和 FLASCO 的研究员。 他于1988年4月5日被传唤到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就1987年12月在《Análisi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证。

(20) Eugenio Pizarro José Ak Aldunate, Roberto Bolton 和 Osear Jiménez 等教士 (第646-88号案件)。 他们在1988年5月23日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 因为他们被控在一封公开信里除其他外, 批评武装部队在智利境内侵犯人权。

(21) Juan Pablo Cárdenas, Iván Badilla, Fernando Paulsen, Raúl Sohr 《Análisis》的编辑 Cárdenas 于1988年5月26日进入他服夜间监禁判决的中心时被捕。 他被监禁在 Valparaíso 监狱的独房, 直到5月28日才被释放。 同日, 《Análisis》的记者 Iván Badilla 被捕后被监禁在独房; 于4月18日在担任《Análisis》代理编辑时在该杂志上刊登自己一篇文章的 Fernando Paulsen 也被传唤。 1988年6月4日, Badilla 和 Paulsen 被决定要受审判。 《La Epoca》的记者 Raúl Sohr 于1988年6月6日被传到海军检察官办事处, 就与采购武器有关的一篇文章作证后获释。

(22) Juan Luis Zegers Terrazas (第154-88号案件), 律师。 1988年7月12日在 Concepción 被捕后被移送 Santiago。 他因1988年1月25在《Análisis》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被控侮辱武装部队而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

(23) Alberto Gamboa 和 María Inés Llambias, 记者。 他们被控在1988年4月28日发行的《Fortín Mapacho》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侮辱警察而被传唤。

(24) Goston Molzapfel (第2090-87号案件), 律师。 第二军事检察官办

事处于1988年7月19日决定他因侮辱武装部队应该受审判。 被控侮辱武装部队的事实是，他于1987年10月27日就第1797-86号案件提出的书面上假定他的两名顾客受到酷刑。

(25) Jaime Males (第1-88号案件)，律师。 1988年7月20日，他也被传唤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因为被控刊登在1987年12月21日发行的《Análisis》上的一篇文章里侮辱了武装部队。

(26) Filma Canales 《Mensaje》 的电影评论员。 1988年7月，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判她禁锢541天，暂缓执行，理由是她对日本导演Najisa Oshima 的作品 "Furyo" 的影评。

(27) Carmen Hertz, 律师。 1988年8月16日，第四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决定她应受审判。

(28) Felipe Sandoval (第114-88号案件)。 1988年8月17日，第四军事检察官决定因为他被控在电视广播上侮辱了警察所以应受审判。 军事上诉法庭于1988年8月25日维持关于他应受审的原决定。

(29) Mario Papi, 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 1988年8月24日他被传唤，指控他在《Ultimas Noticias》上侮辱武装部队。 他在该文上批评第三军事检察官关于不准保释《Apsi》编辑的决定。

(30) Francisco Herreros, 《Cauce》编辑。 1988年8月25日，他因第四军事检察官办事处的命令在家被捕。 目前他被监禁在普通监狱。



## G. 自由出入国境的权利

G.64 Sergio Poblete Garcés, Efraín Jaña Girón, Ernesto Gálaz Guzmán, Alamiro Castillo Aliaga, Otto Becerra Schwart

及其他21名前军人。1988年8月18日，Santiago 上诉法庭收到替这些人申请“人身保护”的要求。申请书认为，内政部长根据宪法过渡时期规定第24(c)，以“共和国总统名义下的命令”并以这些人对“法律和治安”构成威胁为理由而禁止他们进入国境，是任意无凭，不适当而且非法的。以前当过军人的这些申请人，是在经过军法审判后于1975年被第504号最高法令流放国外的。申请书上说，禁止他们入境的措施不合法，因为该措施违反了1978年4月19日第2191号法令。该法令第2条规定对在1973年9月11日至发布该法令之间这段期间被军法审判判处有罪的人实施大赦。所有的申请人都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政府企图以行政措施妨碍第2191号法令的实施，令人费解。就算没有所称的大赦，这些申请人都已服完最初通知剥夺自由以后颁布的流放国外的判决年限而有余。

#### 四、结论

25. 在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编写的本报告里，特别报告员认为回顾1985年2月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他就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提出报告时妨碍着在智利境内行使人权的一些较突出的因素，是很合适的。从1985年2月在日内瓦促进智利境内自由事业的许多团体的立场，特别报告员可以很生动地回顾当时的紧急状态、大量的国内流放、大批人被流放国外，Mapuche印地安人的各种问题以及当目前的政权刚开始掌权并禁止政党活动时的失踪事件等。

26. 特别报告员刚开始执行他受委托的任务时，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在得不到智利政府的正式协助下，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然而，特别报告员一接到这个任务，立即开始跟智利政府高级官员进行非正式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来在圣何塞和在蒙特维的亚。他利用这些机会把上段所提的这些问题以及与其任务有关的其他问题提出来，以期取得智利政府的承认和正式合作。1985年7月，当特别报告员为了更容易从智利人取得更可靠的资料而到蒙特维的亚去的时候，事情有了发展。

27. 在圣何塞会谈之后不久，紧急状态于1985年6月17日解除。至于在1985年2月被禁止进入智利境内的4,348名智利人当中，到了1988年8月30日，其名单只剩518人。1988年9月1日，智利政府宣布，除了正在服放逐国外的判决者外，取消所有智利人的流放命令。特别报告员认为这在尊重人权方面是向前迈进了肯定的一大步，同时，也把特别报告员被任命以来一直不断地建议的一项，付诸实行了。

28. 让很多人生活在普遍悲惨的情况下的，国内流放的行政措施于1986年10月终止。1987年3月，前外交部长Clodomiro Almeyda 是很显著的例外，

29. 当特别报告员曾经见过面并对他有好评的调查法官Carlos Cerda进行深入调查，结果有了重要发现，指向当权者有人牵涉其中，因而使这件事更受重视并被当作一回事时，有人失踪的问题特别臭名昭著。

30. 在有关政党的宪法基本法的保护下，新的政党正在陆续合法地成立。特别报告员一向很关切这个基本法及宪法其他基本法。在他同政府官员会谈时，特别报告员一直主张必须早日通过这种法律，作为成立可能对保障人权有帮助的政治结构的先决条件。这类法律当中，唯一尚待拟订的，就是跟国会有关的宪法基本法。已经开始生效的宪法基本法包括关于选举法庭的宪法基本法、关于选民登记制度和选举事务的宪法基本法、以及关于区域选举法庭的宪法基本法。

31. 智利政府一直不断公开有效地跟人权委员会合作，主要是因为它对特别报告员有信心。智利政府在授权特别报告员正好在1988年10月5日举行全民投票时第四次访问智利的通知里，有关于特别报告员的如下一段话：“这项决定，是出于智利政府一向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出于对特别报告员个人的尊敬”。

32. 特别报告员，现在和过去一样，很感谢智利政府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并非毫无问题——其中也有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曾以应有的坦率和努力针对所有这些问题。出于自尊、对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尊重、以及对人权大义的尊重，特别报告员随时努力保持独立不倚的判断。

33. 当然，这种合作曾遇到一些障碍，也经验过紧张的时候，使得这种合作处于不必要地危险的立场。那是由于智利政府所称人权委员会和大会所采不合理的态度，亦即不重视特别报告员的各次报告（本报告以前已经有六次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智利政府犹豫不决，自问到底要不要同特别报告员合作，因为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大会及人权委员会既不考虑到也不评价智利政府的合作。上述8月22日的通知说：“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在联合国系统里观察到的结果令人失望，智利政府还是决定，跟以前一样，提供无限制的合作”（特别报告员划线）。

34. 智利政府和智利的公开反对派都有如上引用的评语，其中还带有讽刺味，特别报告员觉得很不自在。然而，特别报告员觉得，这些话至少有些根据，而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一方面，特别报告员觉得自相矛盾且没有建议性，因为他被指定一项很敏感而复杂的调查任务，而本来在他们试图评价智利境内人权情况时应该求他意见的机构，却对他的意见未给予其应得的注意。虽然特别报告员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也不期望他的意见被认为是唯一有份量或被认为是权威性的，至少他应该可以合理地期望他的工作被认为是出于对人权事业崇高尊敬的产物，是出于诚心诚意想同男女智利人合作的产物，是对一个复杂的问题的一种贡献，他对这个复杂问题作了认真的第一手研究。

35. 而且，站在大会，特别是人权委员会的立场，特别报告员在帮助它们执行保护人权的职责，从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方面是有用的。因此，避免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而是正相反地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而让特别报告员失去信用和效用，是合乎人权事业的利益的。应受责备的是那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是反对人权事业的，虽然在背后操纵的人

们可能自认是出于至上的动机而没注意到，他们这么做，是破坏联合国在国际大家庭一般人士眼里的形象。

36. 无论如何，正如特别报告员已向智利政府和人民指出的，智利人民从特别报告员所请求并得到的合作获益，以及从特别报告员坚持他的建议获得执行获益。与特别报告员的关系值得维持下去，因为除其他外，特别报告员的身份，可以在政府同反对派之间扮演公平的中间人的角色，可以协助协调确保人权。事实发展如此。特别报告员还可以利用与政府的调停人的立场，解决一些个别案件，这也是常发生的。至于其他的，诸如失望、幻想破灭、甚至在所有各方所造成的困扰，都可由尊重每一个智利人人权的尊严方面所得成就来补偿而有余。这是最重要的。正如沙翁所说：“结果最重要……”。

37. 尽管智利政府在开始的时候拒绝同联合国系统维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尽管智利的一部分舆论不太了解特别报告员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在本结论开始时所描述的以外，特别报告员还可以指出下列几点：（a）他对非法逼供的不时关注（逼供的极端为酷刑），是导致采取向这种可怕的作法进行战斗的各种措施的肯定因素。这种措施包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同警察、调查警察和内政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之间的双边协定。内政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的职权，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已扩充到可以审议人权及其他事项。这三个协议的目的在协助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采取行动保护被询问者和被监禁在独房者的身心尊严。经过各种经验而加以订正和改进的这些协定，已经产生肯定的结果；（b）警察总监 Roberto Stange 将军关于亲自处理由特别报告员或智利人士或团体交给他的与他部下的行为有关的抱怨，进行调查和在必要时执行所需处罚的决定，是一种积极性的态度；（c）Fernando Paredes 将军在处理关于调查警察的抱怨方

面也采取类似的措施； (d) 警察逐渐回到他们的传统职务——维持治安，这要归功于警察总监的坚持，而这件事对尊重人权有肯定的影响； (e) 特别报告员再也没有接到关于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士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的诉苦； (f) 从未听过比下列犯罪更臭名昭著的罪行：诱拐三名 AGECH 成员并将他们的喉咙切开、烧死 Rodrigo Rojas 和 Carmen Quinrang、1987年9月15日的凶杀案和所谓“Corpus Christi Killings”以及“Operation Albania”。令智利舆论和国际舆论沸腾的“Causes Celebres”之谜至今未破令人愤慨，绝不是没有道理； (g) 然而，对于刚从放逐国外返国或涉及反对党活动的人士，以及因触犯与国家安全及有关事项而被监禁人士的恐吓继续存在。进行这种新的恐吓活动者只敢匿名行事，但是法庭总算确认了从事这种可恨的违反人权的行为的几个团体中的一个私人团体。当特别报告员获悉此类具体案件时，他便将这种案件转递给智利政府，并请其采取措施。到目前为止，这类事主要是通过警察总监，他会立即采取措施提供保护，有时特别报告员还安排诉苦者和警察总监直接见面； (h) 恐怖主义者的脱离常规的罪行继续横行无阻。他们最喜欢的对象是警察，虽然其他人也有受害的。以一切残酷应受谴责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行为，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利他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的行动是无差别的，而且非常扰乱社会秩序。恐怖主义行为加强任何文明社会所面对的冲突，而无助于其解决，然而恐怖主义者和利用他们的人却厚颜无耻地号称他们正在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采取合法行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恐怖主义正当化，智利境内的各界人士必须利用在他国证明有效的国家宪法上的适当途径坚决地跟恐怖主义进行战斗。否则将出现依靠武力和恐怖主义行动的，足以把这个社会变成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无疑地，恐怖主义是在智利境内享受人权很难应付的障碍； (i) 智利的司法制度仍旧拥有重大的，制度上的障碍；虽然目前有迹象表示，民事司法制度内部人员开始对此有反应。对于宪法的现状，正在出现必要而受欢迎的挑战。宪法的现状违反司法部的目的，特别是违反了古典派和现代派宪法主义所指定给司法部唯一重要角色——根据各种基本原则以及代表着以众人的同意为基础和依据的

代议民主制的特征的宪法构架来保护自由，这个角色。无论如何，现在两种紧急状态都经宣布解除，希望民法系统会有一个纲领可以根据它向限制或削弱民法系统的任何力量挑战。(j) 军法系统的态度和作业程序毫无改变，它愚弄民主的司法保障，甚至表示不把民法系统放在眼里。在过度热中于累积审判的件数，特别是在调查1986年12月7日那应受谴责的谋杀智利总统及其助手一案的原因方面，军法系统存心暗中破坏并漠视民法系统。(k) 被告律师对于那些由军事法庭移到民事法庭的案件(见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88/7)) 无法鉴定其作用。特别报告员坚持应落实政府的承诺，而政府亦再次承诺鉴定这些案件；(l) 预期于1988年10月举行公民投票，15年来一直限制智利人自由的，加在智利人头上的两种紧急状态终于在1988年8月25日解除了。这代表着有效保护人权方面很显著的进步，当然，也是为了举行公民投票，因为投票权的享受只能和其他基本权利同时享受。它们是行使各种自由最重要的工具，因为这些基本权利涉及征求人民的意见，而代议制民主国家就是以人民的决定为基础的。

38. 特别报告员在他上次报告里提到，每次访问智利时，以及在智利以外的地方公开谈话时，都建议解除这两种紧急状态。不久以前，在8月间，哥斯达黎加报刊登了一则据说来自圣地亚哥的消息称，智利内政部长 Fernandez 先生曾说过，紧急状态和公民投票是，或是可以两立的。特别报告员立即与智利驻哥斯达黎加大使 Juan Bantista Algria 先生接触，表示这个消息引起他的惊讶和警惕。后来，智利大使把内政部长的发言全文提供给报告员。Fernandes 先生在他的发言里的确说过，在理论上，紧急状态“同自由公民投票完全可以两立”；但紧急接着又说，“这并不就说，紧急状态会维持到公民投票的时候”。特别报告员在他最近一次报告里提到公民投票，对智利境内人权情况而言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将是当前的政权所采取的制度过渡到代议民主制度的一次考验，但比什么都重要的，那将是对智利政府同反对党派关于建立一套基本法律规定，确认和保证各种民主自由，作为保护所有的人不受独裁势力攻击的不可或缺的尊严的基础的一次考验。

39. 当然，即使——正如它必须——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证明是真正民意的表现，这还不是与被统治者协商关于怎样才是把智利推向宁静、有活力而面向改革的代议制民主最佳途径的，正常而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法。特别报告员已经在其他的报告里表示过他比较喜欢所有的政治党派都能站在平等的立场或可以相容的立场竞争的直接全民投票。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从此开始可以逐步达成的最后目标，这次公民投票可说是有什么可行的就参加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应该强调，在理性的推动下进行的人类的活动，向来是靠求其至善，而不是靠死守老套，成为高贵的。人类的活动一向是在所有各方面改良现状，为了人类社会的福利加以画龙点睛。这代表着对人类无穷尽的创造性想象力要求最高的挑战，这在人类求自由和自由的保障方面特别为真。

40. 再者，关于智利人民在此重要关键时刻在普选和公民投票之间选择，值得回忆的是亚伯拉罕·林肯说过的一句话：“关于接受或拒绝某事真正的考验并非此事有什么不好，而是此事坏的成分是否多于好的成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只有坏处或只有好处的。”

41. 尽管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和上一次报告提到一些肯定的成果，在复杂的智利人权情况里，还有很多事等着去做。为了向智利人民的一切自由提供保护，除了上述各种问题以外，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还有许多情况急需改善。从某些观点看，不论其结果如何，并且假定——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一次公民投票里选民的意志的确受到尊重，那么这一次公民投票将是争取人权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吉利的开始。

42. 有些普通的刑法规定是镇压性措施的来源，这些措施从民主的观点看极其残酷，并会使事情不顺利。特别报告员觉得，鉴于目前政治方面显然出现曙光，应对这些措施加以研究，因为这些特别刑法跟目前这新的充满希望的，政治上可能有改变的情况成了显著的对照。的确，即使没有目前这新局势的出现，这些法律



本身就需要紧急但谨慎的改善。这类法律包括：反对恐怖主义法、火器和炸药管理法、国内安全法、军法以及宪法第八条补充法等。同理，刑事诉讼法是行使立宪民主国家固有的司法保障的障碍。

43. 现在紧急状态已经宣布解除，这是代表着向有效充分保障人权跨出一大步的发展。专为受智利政权控告人士提供法律保护的，颇受尊敬的一个智利人的团体的发言人向特别报告员描述此事说：“很重要，很受欢迎”。为了让智利宪法、《美洲人权公约》（《圣何塞公约》）、《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司法保障生效，必须通过不断改善这些法律来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44. 而且，因为两种紧急状态宣布解除了，民事法庭和军事法庭都可能下令将被指控者和被逮捕者监禁在独房里，从而阻挠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根据它同行政当局所签订各种协议正在进行的工作。当然，特别报告员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府当局不应该拥有针对颠覆活动保护自己的适当法律工具，或者政府不应该拥有应付威胁群众自由或一般性扰乱治安者的能力。特别报告员的意思是，必须利用解除两种紧急状态带来的特殊情况，把这些刑法改善为更合情合理。紧急状态的宣布曾赋予政府当局很广范的权力限制群众的自由。

45. 特别报告员所特别关注的是，例如，适用宪法第8条补充法的结果可能产生的后果，因为该法规定的处罚很严重，其可谴责的极端，甚至禁止一个人不仅不能担任公职，而且担任一般平民的工作如当大学教授或当中小学教师。这远超过一个理智的社会对严重的反社会行为的处罚反应，因此违反自由刑法的原则和实践。自由刑法本为代议民主制度的产物，它污烂到变成独裁政权的恶果。

46. 军法也超过了民主社会为了在不侵害群众自由的范围内保护作为一个机构的武装部队而建立的合理的限制。在智利境内，这种用以保护的权力却被滥用了，因为这个军法将军方和警察部队捧成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因此这是令人讨厌的、

有害的，而且是反民主的。例如，当高级军官认为记者和一般新闻工作人员在军方认为他们的话有敌意或侮辱了武装部队时，便受到骚扰。这些高军阶军人这样做，是过份敏感地以狭窄的观点采取行动，而不知道他们这种过份的反应，正好引起人们怀疑，即到底这些军人自己认为他们如此过份热心地在保卫的机构有多安全的问题。

47. 特别报告员对前一段中所述，他在先前的报告和同新闻界的谈话中讨论中的状况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针对新闻传播工具编辑和新闻工作人员的法院行动并未停止。相反地，特别报告员从可靠的来源得知，新闻界受侵扰的情事又见增加，一种侵扰方式就是向新闻工作人员发传票——一般都是传唤到军事法庭的传票，以对涉嫌侮辱武装部队的新闻工作者提起诉讼。

48. 1988年8月25日，反对派的一个来源说，有24名新闻工作者以各式各样的这类罪名受审。1988年8月5日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有24名新闻工作者因上述理由候审，其中八人已经受审（其中一人并已受审两次），另有一人被处以一年半的夜晚监禁。

49. 关于这些新闻工作人员的审判，特别报告员要指出的是，报刊的一些文章或评论在任何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极苛刻的批评，甚至超过了为代议制民主政体所确认的某些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度。但是至少他所看过的新闻工作者受到控告的文章不应构成这类审判的理由，特别是因为即将举行公民投票，人民将在特殊情况下行使投票权，以寻求步向充分民主的社会的方式，在这类重要的政治活动前夕，更是如此。

50. 特别报告员认为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987年，一份周刊刊载了有关11名犯人到目前为止已持续26天的绝食抗议的访问。接受访问的是其中一名犯人的律师，他除其他外说，“Iasili案件正是说明特别检察官Torres的能耐的另一个例子……。Torres可以为所欲为……。舆论必须认识到，军事审判制度已成为合法的镇压工具……。毫无疑问地，如果这儿的任何人遭到不

幸或死亡，特别检察官 Torres 应负首要的责任。特别报告员认为，从民主的观点看来，上述谈话不可能构成对进行采访的记者提起诉讼的理由。但事实上，该记者和表示上述意见的律师都因此而受审。

51. 智利有很多新闻传播工具，其中有些为反对派所掌握，极其有力地表示他们的意见，但是特别报告员仍旧严重关切该国新闻界这种令新闻工作者感到危惧的处境。他在本报告中重述了第五和第六次报告中的一些意见，但是由于连即将进行的公民投票都未能制止对新闻工作者的侵扰，他现在认为需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事实上，据可靠的来源说，从 1988 年 1 月到 6 月间，有 64 名新闻工作者被传唤受审，他们甚至在事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受到传唤。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不但很费解，也侵犯到言论自由和批评国家机构的运作方式的自由，而这两种自由对于公民行使其监督统治者的行为的权利，是极其重要的。

52. 特别报告员从 1988 年 5 月以来就一再向智利政府表示关切新闻工作者受审的情事。他甚至于 1988 年 6 月 24 日写信给 Luis Escobar 大使，表示他的意见。该信中有一段说：

“对涉嫌毁谤或伤害政府工作人员或武装部队的人提起诉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此之外，应当以一种较宽容、较合乎民主作风的态度看待对这些政府机构提出的严厉、甚至过头的批评。我认为，在过渡到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期间，特别是即将举行公民投票的期间，这一点尤为重要。目前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当普遍实行克制。国内必须存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以便能够从各种观点讨论公民投票和有关民主化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政策的任何其他问题。”

53. 因此，特别报告员相信，当局将会考虑到他的意见，他极其关切的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杰出的美国知识份子、外交家和政治家艾德莱·史蒂文森说过这样一句话，“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本，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手段。”

54. 这些“结论”的另一部分说明了非法胁迫这个严重问题的改进（特别报告员已在前一次报告中指出这种改变）。但是特别报告员在 1988 年 8 月底访问

日内瓦期间从可靠来源得到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即从1988年1月至6月间，有关人士就22宗各种形式的虐待——甚至身心折磨——案件提出了控诉，本报告第三节中摘要说明了这些案件。特别报告员摘要说明这些案件并不表示这些控告已经法院证实，特别报告员也未必相信这些指控，但是他最关切的是将这些指控予以核查。另一个更灵通的非政府消息来源后来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本报告和前一次报告中提到的监督和保护被拘留者的制度继续有效，但似乎非法的案件数目比揭发的案件数目和特别报告员在本段所述的案件数目大。经消息来源还说，虽然没有系统地施用酷刑的情况，但仍看到一些这种情况，目的在迫使因被指称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相关罪行而被拘留的人提供情报和招供，特别是在禁止与外界联络期间（适用反恐怖议法第11条）。政府保证这些所谓“意外”案件没有得到正式核可。特别报告员在下次访问智利时（1988年10月）会如同在其他场合一样，特别促请注意这个问题。

55. 特别报告员也极其关注新旧强迫失踪案件。对于旧的这类案件，他已在先前的报告中表示了他的意见，甚至附上对Carlos Cerda法官的调查结果导致重要的新发现和结论时政府宣布的大赦和最高法院对预审法官的行动的做法提出的评论。特别报告员再次对这个严重的问题深表关注。

56. 特别报告员最近得到有关1987年9月报导的五宗新的强迫失踪案件的可靠消息。根据这项消息，先前似乎没有确实证据的两宗案件现在已得到新的证据。他认为，这两宗案件，连同另三宗案件，应当作为被指称的由警察当局行动引起的新的强迫失踪案件处理。特别报告员已在前一次报告中指出，这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情况，五名受害者甚至有生命之虞（见E/CN.4/1988/7，第114-115段）。因此他认为，政府应当最密切地注意这个问题。

57. 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军事上诉法院所作免除三名犯人的死刑的裁决，由于最高法院明智地出面干预而得到确认。最高法院拒绝接受政府运用补救办法对军事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的控告，特别报告员也认为这项控告很过分（见E/CN.4/1988/7，第116段）。

58. 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和其他有关罪行的被拘留者的处境仍旧没有得到改善。正在接受或将由特别检察官 Fernando Torres 上校审问的被拘留者处境最为恶劣，因为 Torres 上校并未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规则行事。例如，他下令长期被拘留者与外界接触。一名被拘留者，Mario Vega Varas 被单独禁闭46日之久，他还打算处理绝大多数涉嫌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有关的案件。有人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有些被拘留者经特别检察官 Torres 下令单独禁闭后，又被提送到另一个“真正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这意味着他们还将受到一段期间的单独禁闭。

59. 此外也不断发生长期单独禁闭然后因缺乏证据而予以释放的情事。

60. 新订的一些监狱规则使被拘留者的处境更为恶化。被拘留者的亲戚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根据他们的经验，任何信件，外国出版物或照片都不准带进被拘留者的拘禁处所。此外，1988年8月，所有准许被拘留者的家人定时探视被拘留者的探监证都被撤销。结果现有大群人聚集在监外，使犯人和探监者陷于一种紧张状况，探监者往往得等候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雨中等候探监。

61. 1987年12月，特别报告员访问智利期间，有人指出，他应当要求允许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在一般探监日以外的日子访探视处于前一段中所述状况的犯人，以给予他们较好的个别的照顾。从那时以来，一再有人提醒他这一点。报告员认为这项要求很合理，也是办得到的，他已经向智利政府转达了这个意见。

62. 特别报告员已就马普切人的状况向智利政府提出建议，但是据一个最大的设法维护马普切人权利的组织说，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那种改善。第2568号法令仍旧得到“充分的”执行，从而侵犯了马普切土地的完整，因为当局不顾土著居民的愿望，将他们的土地分成个别的区域。由于这些土地的居民过于穷苦，付不起土地税，他们的土地被拍卖，居民则被迫迁，从而引起了同警方对峙的一种紧张局面。马普切人在日内瓦会见了特别报告员，他们告诉报告员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变”。特别报告员对此感到忧虑，因为他曾

建议政府“改变对马普切人的官方政策，特别是改变有关土地划分的立法”（见 E/CN.4/1988/7, 第145段）。

63. 迫切需要宣传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公约的批准，以使这些公约在该国生效。智利政府也应考虑批准《美洲人权公约》（《圣约瑟公约》）。

64. 也应宣传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特别报告员一再提出呼吁，尽管这两项公约都已经批准和颁布，但是仍未在《官方日报》中予以刊载，然而又没有任何因素阻碍《官方日报》刊载这些公约和盟约。

65. 智利的经济欣欣向荣，但是工人的工资仍旧极低。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现象——一种令人愤慨的矛盾，同时也违反了人权。

66. 智利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根据该国的经济计划，并且由于该计划的执行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由于巨额的外债，较为优先注意失业问题而不是增加工资的问题，但是政府认识到工资问题并在设法予以解决。

67.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对智利劳动人民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享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智利劳动人民对智利经济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贡献，不应一直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智利政府应当施行较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的计划。

68. 特别报告员仍旧特别关切贫民窟居民，尤其是圣地亚哥贫民窟居民的状况，因为他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并决心将重新大力增进他们的福利作为完成他的任务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此外，特别报告员一直在作出不懈的努力，设法向智利政府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 五、建议

69. 对非法胁迫的斗争，特别是对酷刑和虐待的斗争，必须大力进行下去，直至这种对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的可恶的侮辱消灭为止，从而保证对适当法律程序的尊重，这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固有自由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当他已暂时失去这项自由或有失去这项自由的危险时更是如此。

70. 为了实现上面所说，政府必须加倍努力，以更大的毅力、决心和效率来使负责进行审问和负责将人单独禁闭的较低级当局注意官方对这种行径的反对态度，如特别报告员曾阅过的政府指示所说那样。

71. 同样地，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签定的各项协定必须忠实地遵守，并根据经验来修订，使这些协定更加行之有效。

72. 在同一方面，政府和整个智利社会必须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该委员会正作出并将继续作出非凡的、必不可少的和值得称赞的人道主义工作。

73. 特别报告员认为，对于国家民主生活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政府应作为首要优先事项，保证其警察当局合作调查有关下列人士的臭名昭著的案件：喉咙被割断的人；1987年9月5日夜晚被谋杀的人；被烧死的人以及在“阿尔巴尼亚行动”或“圣体节屠杀”下死亡的人。这些极其严重的案件大大有害于智利人权的状况，因为法院收到的控告信里指出有武装部队人员牵连在内。政府如信守其改善人权状况的诺言，就必须作出必要努力来使人了解这些罪恶事件，这些事件显然与智利的政治局势有关，特别是与逐渐削弱智利社会的苦难和暴力的汹涌暗流有关，虽然一些智利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把智利社会撕裂和使智利人无法和谐生存下去的因素。

74. 政府必须作出类似努力找出那些对不支持政府政策的人进行恐吓的人。这种行为既不负责任，而且是懦弱的表现，严重妨碍许多智利人享受自由，并给智利人权情况蒙上污点。

75. 政府也必须依法大力打击那些袭击政府要员的武装匪帮。

76. 关于国民大会的宪法基本法应毫不迟延地完成，以便公民可参与讨论，成为建立为保护他们的人权所需的代议民主制的过程的一部分。

77. 还必须结束制订所谓“秘密法律”的制度，这种制度有损于民主法制的原则和做法拟保护的 personal 权利。

78. 政府必须作为紧急事项，对反恐怖主义法、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国家国内安全法、军事审判法以及补充宪法第8条法进行仔细的修改。这些法律载有过于严厉的规定，它们既与宽大民主的刑法相矛盾，又不符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为了实现这项目标，不宜进一步激起受严厉法律条款限制的人或其家属的感情。

79. 同样地，政府和军队都必须改变其对新闻界特别是记者的态度，以便结束记者们因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和被统治者监督统治者的活动的权利时批评军队或政府而经常被起诉的局面。这种必要的一定程度的自制是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妨碍处罚正常法律制度里所指的那种中伤或诽谤行为。如果政府和军队在言论自由这一敏感领域表现节制，那么智利不仅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介，而且还会使政府关于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声明增加份量。“没有智慧的盲目力量为其本身的重量打垮”（贺拉斯著《诗集》）。

80. 同样地，特别报告员根据与上述各段所建议相符的其他倡议并严格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建议赦免前外交部长 Clodomiro Almeyda Merino 先生和《分析》周刊记者 Cárdenas 先生。此外，鉴于政府关于结束对流亡行政人员的惩罚的决定，Merino 先生应按自由民主刑法下的宽大原则给予赦免。因此，特别报告员重申其在1988年9月2日给 Mario Calderón Vargas 大使的信中为这两个人提出的请求。

81. 为了缓和智利目前的气氛和促进人权的事业，并基于人道主义理由，政府和军队应停止对已在候审的记者发出禁止令。基于同样的人道主义理由，特别报



告员建议政府赦免在当前的审判中可能被判刑的记者。

82. 政府和智利社会中与政府同盟或反对政府的各界人士必须作出特别努力来反对暴力而不论其来源为何。并减轻最近或将来引起痛苦的根源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激进主义使分裂加深，妨碍社会各界人士在寻求合理解决任何国家均会遇到的政治问题时民主地发表不同意见。罗斯福于1939年说过：“激进者是双足牢牢立于空中的人”。鲁莽的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是一对双生子，它们憎恶“容忍”这个字，是人权事业的天然和强大的敌人。

83. 毫无疑问，对于恐怖主义，上面所说尤其真实和可悲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疏远任何种类的激进或极端学说，必须谴责和以民主这个适当武器来反对恐怖主义，但绝不能用独裁政权所喜爱的国家安全理论这一应受谴责的反效果的武器。

84. 政府和智利社会各界人士必须努力与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属和失踪者家属进行有效合作，减轻他们的痛苦，协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85. 政府必须加倍努力防止警察以暴力造成死亡，即使事实证明这样做对警察不利。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政府暴力没有象其他期间那样有所扩大，但根据非政府来源的可靠消息，似乎有确凿的证据指出，不适当的态度显然是存在的。为了那些被认为是暴力死亡的受害者的利益并为了社会和谐的利益、特别报告员希望政府或法院将能证明有关的指诉是无根据的。

86. 最近，当总司令委员会宣布其指定的公民选举候选人的名字后，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大众游行中据报有三人被警察杀死。

87. 虽然特别报告员尚未接受所收到的载于本报告标题为“新的违反人权的指控”的第三节的违反人权的指控，但他相信政府将会迅速有效地处理这些指控。特别报告员已向政府提供机会对此加以评论。关于不同种类和不同强度的非法胁迫包括酷刑的指控，政府特别决定并响应特别报告员的建议，甚至答应尽早对关于新指控的备忘录给予答复，政府认为这些指控夸大其词，没有事实根据。

88. 政府的答复载于本报告另一部分。不过，特别报告员尚未有时间加以评价，因为它们是在本报告定稿时才收到的（见附件一）。

89. 政府必须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强迫失踪案件进行调查，这些案件不在负责调查的 Cerda 法官进行的调查范围内。受害者家属继续遭受这种置人权于不顾的残酷行为的毁灭性打击，他们的案件绝不应忘记。

90. 政府和智利社会各界人士也必须努力寻求办法来重审 Cerda 法官调查的案件，这些委托 Cerda 法官审理的 10 多个案件由于被指控的作案者获得大赦而突然和不公正地结束。Cerda 法官曾作出值得赞扬的努力试图在智利民事审判制度下审理这些案件。这个制度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为智利法律秩序所摧毁，然而智利一名政治家却千方百计想使特别报告员相信事实不是这样，但他的教条主义说法不符合律师、辩护人和甚至法官每日经历的严峻现实。据该政治家说，智利司法审判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不现实的说法的目的是阻挠对真正发生的必须予以纠正的事情进行任何调查。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记住江奈生·斯威夫特在《拉普他岛游记》里所说的话：“凡是跨张悖理的事，无一不为一些哲学家认为是真理”。的确，进行与哲学毫不相干的但通常被认为是学术的活动的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91. 特别报告员知道按上一段所作建议行事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作出富于想象的和切实的努力。例如可任命负责调查的 Cerda 法官或其他一些法官至少完成该调查工作。但又不妨碍大赦，这样做的好处也许是能知道在目前的政治政权掌权初期被迫失踪的受害者遭遇到什么事情。其他事情可以稍后才予处

理，可行的解决办法也许会在新的条件下出现。最坏的是不去寻求解决办法。因为这会使社会紧张局势持续下去，而受失踪案件直接影响的人的痛苦也会永无止境。

92. 由于囚犯只能在法官（民事或军事）命令下才能单独禁闭，重要的是，为了根据上述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达成的协议避免非法胁迫，政府和智利境内与这一重大问题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应合作寻求法律办法，将与红十字会达成的协议适用于遭受这类司法单独拘留的人。特别报告员希望在这方面能出一把力。

93. 特别报告员希望其载于较早的报告但本报告未予评论的其他建议将会予以执行。其中包括这样的建议，即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他根据其经验，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和根据为此目的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行事）以及促进尊重人权的各组织，作为优先事项，同返回其国家的智利人合作，解决由于他们返回而需要解决的和解问题。这项建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执行。

94. 必须将调查局长关于必须尽力注意避免和防止非法胁迫的决定，适当公布。这样，这个决定才会更有效，因为这除了别的之外，会让人民能将充分参与落实这个决定（见本报告第12段）。

95. 最后，特别报告员建议这份报告应整份通读，因为它是一个协调的整体。

## 附 录

### 附录一

#### 智利政府对本报告第三节内所载指控的答复

以下是智利政府对特别报告员所收到并且载入本报告第3节内关于新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控诉的答复。特别报告员无法就这项答复作出评论，因为这是在他访问智利结束时并且在报告完成之后收到的。结果，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和建议并未考虑到智利政府的这项答复，在他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下一个报告内将考虑到这项答复。

“特别报告员在同智利政府的代表，马里奥·卡尔德龙·巴尔加斯大使会见时，交给他若干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这些指控是他在今年上半年获知的。

特别报告员说，这些指控是为资料的目的而交出，在他收到智利政府的答复之前，他不会就这些指控表示意见，这是他会报告内指出的。

这些指控交给了指控所针对的各处的处长注意，他们立刻下令，在不损害大多数案件所进行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应该进行行政调查，尽可能正确地确定那些指控是否属实。

特别报告员在他第四度访问智利时，由警务处总干事、警察调查局总干事和国家调查机构总干事亲自接待，他们交给他他们到目前为止所编辑的资料。在不妨碍上述的情况下，他们告诉报告员任何有关的新增资料将继续通过卡尔德龙大使转交给他。

关于所提到的那些情况，特别报告员获得一些档案，其中有调查的背景资料和摘要，并且附有要求将这些资料收录在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内。<sup>a</sup>

警务处从所有这些调查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除了在摘要中所提到的一些例外

情况之外，对于警务处的指控或者是毫无根据，或者是正在司法调查中。

对于警察调查局的控诉也在同一天转交，连同一个很厚的档案，其中载有为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更多详细背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在每一个案件，都进行了彻底的行政调查，但是不妨碍控诉者所提出的司法诉讼（并非所有案件）。

因此，在关于Alberto Recaredo Gallardo Pacheco, Catalina Ester Gallardo Moreno, Roberto Gallardo Moreno 和 Moni-ca del Carmen Pacheco Sanchez, 极端运动MIR 的所有成员，这些人从未受逮捕，甚至也没有被调查局通辑。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Franciso Villalón Pérez, Claudio Paredes Tapia Nelson Garrido Cabrera 等人是在他们正在制造的一枚炸弹爆炸时死亡。

Manuel Rodríguez 革命阵线的一名成员，Enriqueta Yao Moreno, 是按照一个司法逮捕状，为了一些极为严重的刑事罪而逮捕并且由有关法院处置。

Horacio Díaz Trujillo 是由于企图行刺共和国总统而被逮捕。按法院命令，他被隔离监禁10天，于1987年12月18日由有关的军事检查官办事处处置。

Manuel Antonio Ortiz Lecaros, Rosa María Olivier Manriquez,  
José Armando Muñoz Ramírez, Liliana del Carmen Montenegro Rebolledo,  
Victor Herrera García, Ruth Cabrera Hinostroza, Cecilia de la Nieves  
Novoa Carrasco, Raúl Armando Figueroa Guajardo, Marcos Guajardo  
Morales, Miguel Arriagada Ramírez, Corina del Carmen Vásquez Ramírez,  
Cecilia Reyes Rodríguez, René Miranda Barrales,

Guillermo Antonio Pavéz Guerra, Carlos Valencia García,  
Jeanette Valencia García, Mauricio Andrés Valencia García,  
Osvaldo René Gallardo, Mario Valenzuela Martínez,  
Lorena de los Angeles Nazal Sagle, Héctor René Miranda Luengo,  
Roberto Ignacio Ramírez Valle, Manuel Casanova Azagra  
等人从未被警务调查局逮捕或通辑。

关于所谓受威胁或恫吓的其他控诉，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应该就此回顾，正如警务调查局主任去年12月在同特别报告员会见时所说，警察甚至在没有等候一个司法申请的情况下，对任何由于受到威胁或恐吓而要求保护的人给予保护。这项保护的效用已经由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些威胁没有一件发生。

对于国家情报机构的控诉也由该机构在所附的文件中答复。”<sup>a</sup>

注

<sup>a</sup> 会员国可在人权中心的档案内获得所提到的文件。

## 附录二

### 特别报告员对1988年10月5日

#### 公民投票的评论

智利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认为他有义务简略地提到1988年10月5日在该国举行的公民投票。他认为,这将使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第七次报告能够根据该事件来阅读,该事件对于人权事业极为重要。然而公民投票将是在特别报告员向1989年2月和3月的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详细审议的主题,该报告也将载有他关于1988年10月2日至10第四次访问智利的结论和建议。

公民投票是按照宪法举行的公开投票,作为该宪法为回归代议民主所制订的过程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公民投票的目的是要用投票来决定军队和警察总指挥部所指定的担任共和国总统直到1998年的唯一候选人。换句话说,人民在公民投票中可以选择他们是否接受指挥部所指定的候选人。如果他们接受他为唯一的候选人,该人正好是共和国的现任总统,他就会继续担任总统直到前面所指示的日期。此外,在公民投票的一年之后,必须宣布普选,由许多政党和候选人来设立一个两院制的全国议会。

如果人民投票反对候选人,目前的总统将继续留任一年,并且将在1990年3月以前举行选举,选出共和国的新总统,并举行刚才提到的普选,由不同的政党和候选人参加。

1988年10月5日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举行了公民投票,这些规则和程序确保超过7,400,000名的极高总数的登记选民的投票将会忠实而可资证明地予以记录。

唯数庞大的公民出来投票并且表现了普遍的热情、秩序和尊重彼此的观点。在选举服务处和投票桌工作的人适当地进行他们的工作，武装部队和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执法人员在公民投票过程中也适当地执行工作。

整个10月5日那一天，特别报告员访问了比尼亚德尔马、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等地的一些投票中心和投票桌。在所有那些地方，特别报告员都能亲自看见公民投票如何在各地进行，不同的社会部门在投票，包括一个贫穷的贫民区。他去到的每个地方都见到同样的市民成熟、秩序和广泛而热情的参与，以及绝对尊重选民的愿望，在适当的投票地点反映出来，以及武装部队和执法人员令人尊敬的公平行为。每个人都对他亲切友好，并且同他充分合作：投票人、主持选举过程的当局和政府各成员。

参加公民投票的投票人数非常高，弃权比率非常小。

人们在计算选票时发现反对的选票获胜，支持赞成选票的发言人和共和国总统本身和他的政府尊重了人民的意志。

特别报告员认为他有义务在这附录二中强调，人权和政治参与权同样重要，因此一国人民能够用秘密而普遍的投票，和平地决定它自己的命运，这是按照一般所接受的形式来进行的。结果，公民投票增进了智利人权的状况，不仅是因为它发生了，而且是因为，除了别的以外，公民投票使得在外流亡的智利公民能够回国，并且取消了对享有基本权利造成主要限制的两个紧急状态。

特别报告员也认为，公民投票打开了完成过渡到一个代议民主的路途，代议民主将保障自由，并且公民投票已经创造了一个心态，并且为解决严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尽管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智利在尊重人权方面仍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不仅在这里并且在本报告内，特别是在结论和建议中，都提到这些问题以及所做的进展。

-----